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501

31 December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  
独立国家和领土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人权委员会 1981 年 3 月 11 日第 33(XXXVII) 号决议请秘书长，除其他外，提供“就危地马拉人权情况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本文件载录了此类资料，提交人权委员会。

目 录

|                            | <u>段 次</u> |
|----------------------------|------------|
| 导言.....                    | 1 - 7      |
| 一、所收到的资料 .....             | 8 - 11     |
| (A)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 9          |
| (B) 联合国各机关及专门机构提供的资料 ..... | 10         |
| (C) 政府间组织提供的资料 .....       | 11         |
| (D)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       | 12         |
| 二、原始资料的综述和评价.....          | 13 - 15    |
| 三、所收到的材料 .....             | 16 - 23    |
| 附件                         |            |
| 危地马拉政府的函件                  |            |

##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并通过了第12(XXXV)号决定，决定就危地马拉国民议会副议长、前外交部长、前联合国秘书处成员阿尔维托·富恩特斯·莫尔博士遇刺一事打电报给危地马拉政府，询问有关此案详情。

2.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收到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有关在该国发生的其他暗杀事件的报告和危地马拉政府的答复。1980年3月11日，委员会通过了第32(XXXVI)号决议，题为“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对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表示极为关切，敦促危地马拉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完全尊重危地马拉人民的人权。

3. 决议满意地注意到危地马拉政府作出的决定，邀请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访问该国并就人权情况提出报告。委员会决定根据从各方所得到的有关材料，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查危地马拉境内的情况。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收到了E/CN.4/1439号文件，载有各国政府、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提供的资料，并于1981年3月11日以29票对3票、8票弃权通过了第33(XXXVII)号决议。决议的执行部分如下：

“1.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就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同该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并从各方面来源搜集有关资料；

“2. 并请秘书长就他同危地马拉政府的联系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报告，同时附上所收集的关于该国境内人权情况的所有资料；

“3. 还请秘书长就他同危地马拉政府的联系向第三十六届联大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4. 请危地马拉政府同秘书长合作。

“5. 决定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应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作为优先项目继续审查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4. 根据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段，秘书长于1981年6月17日致函危地马拉政府，转交了第33(XXXVII)号决议。

5. 根据第 33(XXXVII) 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 2 段, 秘书长于 1981 年 7 月 17 日致函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机构和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机构, 要求它们提供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资料。

6. 为了完成人权委员会对他的委托, 秘书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同危地马拉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秘书长在他提交第三十六届联大的报告(A/36/705)中, 说明了他如何设法就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同该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并告知联大, 在编写和提交本报告期间, 他的代表继续同危地马拉政府当局保持接触, 以便建立人权委员会所要求的直接联系。

7. 1981 年 12 月 16 日, 大会通过了有关决定,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同危地马拉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并请危地马拉政府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同秘书长保持合作。

## 一、所收到的资料

8. 1981年7月17日秘书长致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函件发出后，收到了一系列的答复。为了便于分析，所收到的资料分类如下：

- (a)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 (b)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供的资料，
- (c) 政府间机构提供的资料，
- (d) 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 (A)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9. 奥地利、布隆迪、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哈马联邦、荷兰、法国、巴拿马、菲律宾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作出了答复。

1981年9月14日，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载有关于危地马拉境内日常事件的说明，是由法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编写的，涉及到1981年1月3日至6月30日一段时间。法国常驻代表在送文函中说：“我要强调指出，法国政府不能担保这些报告的每一项情报都是准确无误，但总的来说，法国政府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严重的迹象，表明了暴力情况的存在，值得人权委员会加以审议”。

1981年8月17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交了美国国务院1981年2月发表的《人权问题国别报告》中关于危地马拉的一章。

奥地利、布隆迪、荷兰和巴拿马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资料，但表示它们支持人权委员会第33(XXXVII)号决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哈马联邦和菲律宾政府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

### (B)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供的资料

10. 下列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作出了答复：

- (a)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81年8月21日函告难民专员办事处对一些危地马拉难民提供了保护和援助。这些难民主要滞留在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尼加拉瓜。

---

\* 危地马拉提供的资料转录于本报告附件。

- (b) 国际劳工局。 1981年9月17日来函，转告了劳工局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处理的案件数目，并附上了一份报告，载有关于工会权利受侵犯的控告（GB 216/10/20）。
- (c) 世界银行。 1981年7月27日函告世界银行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

(C) 政府间组织提供的资料

11. 欧洲理事会和美洲国家组织作出了答复：

- (a) 欧洲理事会。 1981年8月5日来函，转交了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1980年拉丁美洲人权情况的决议，并转交了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的4477号报告。
- (b) 美洲国家组织。 1981年7月22日发出普通照会，宣称：人权委员会要求资料的信和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第33(XXXVII)号决议已转交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人权司在12月份收到了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1981年10月14日提出的危地马拉形势报告，其中载有下述结论和建议：<sup>1</sup>

“ A. 结论

“ 1. 根据上述背景材料和考虑，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总的结论是，近年来，在危地马拉，暴力行为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政府一直在怂恿或纵容此类行为，从未采取措施来加以制止。暴力行为夺去无数生命，严重践踏了《美洲人权公约》列举的各项人权。

“ 2. 此类暴力行为为害之烈，殃及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武装力量本身和政治、经济界当权人物，但毫无疑问，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死于非命的反对派领袖、工会活动分子、教士、律师、新闻工作者、教授和教师，以及数以百千计的农民和印第安人。

---

<sup>1</sup>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关于危地马拉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OEA/Serv. P-AG/CP/doc.295/81, 1981年10月14日。

“ 3.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暴力行为导致的死亡都可归结为政府当局同保安部队和准军事民团狼狈为奸，非法处决，制造‘失踪事件’，所以政府当局从未认真采取过措施来调查罪行。

“ 4. 这些非法处决和失踪事件不仅侵犯生命权利，而且在地方上造成一种惊惧甚至恐怖的气氛，影响所及，法纪废弛，实际上威胁到《美洲人权公约》列举的大部分权利。

“ 5. 如本报告各章所述，危地马拉普遍的暴力行为表明，虽然危地马拉的宪法和法律正式承认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享受公正审判和适当的法律手续的权利、信仰和宗教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各种政治权利，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限制。

“ 6. 危地马拉社会各阶层之间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别，对该国习见的暴力行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类差别最突出的方面是：近年来，危地马拉人口剧增，将近半数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赶不上人口，二者间极不协调。下层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尤其是在保健、营养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要，完全得不到保障。

#### “ B. 建议

“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考虑了本报告的结论，向危地马拉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 1. 采取必要措施，预防严重侵害生命权利的行为发生，保证政府当局和准军事团体停止参与、纵容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活动，调查并严惩肇事者。

“ 2. 充分运用法律的力量，调查并惩治非法处决、绑架失踪、任意拘捕、私刑毒打一类事件的主谋者。

“ 3. 有效保障危地马拉宪法和《美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工会自由。

“ 4. 彻底改组法院系统，从而使法院系统在人力、物力许可时，真正地实现独立自主，拥有足够的权力具体、迅速地调查侵犯人权的事件，惩治任何肇事者，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

“ 5. 同危地马拉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对话，终止暴行，通过民主、和平的办法和程序来解决危地马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D)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12. 若干非政府组织作出了答复：

- (a) 大赦国际。 1981年9月18日来函，提供了在危地马拉发生的私刑、谋杀、镇压工会领袖和农民、教士和神职人员失踪和被害等等事件的材料。
- (b) 国际学生联盟。 1981年8月3日来函，提供了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学生遭受攻击的材料。
- (c) 国际人权联合会。 1981年7月28日提供了材料，报导“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一成员和“国际人权联合会”一专家到危地马拉调查的情况。
- (d) 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 1981年8月18日来函，对绑架妇女、杀害妇女和儿童、以及发现秘密基地的情况，表示关切和震惊。
- (e) 议会间联合会。 1981年7月21日来函，报导了阿尔维托·富恩特斯·莫尔事件的真相，并附上议会间联合会四月份就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一致通过的决议。

在编写本文件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参考了两份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报告，一份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1981年1月22日的报告，另一份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1980年10月的报告，题为“危地马拉的人权问题”。另外，还参考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出版物（CIJL Bulletins Nos.4、5、6和7）。



## 二、原始资料的综述和评价

13. 第三章所列举材料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导，主要是由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提供，其中有些是在危地马拉本国收集的资料。

14. 如何评价关于危地马拉人权受到侵犯的指控，如何确定目前审查的材料是否可靠，是一个问题，因为联合国至今未能实地调查该国的人权情况。但上述资料来自许多不同方面，似乎都一致表示：危地马拉的人权受到了严重侵犯。

15. 这些资料是比照《世界人权宣言》各项条款分别标题列示的，但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在该国，生命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许许多多的人，不论是在城市或是在农村，属于哪些不同社会、宗教、群体、劳工或政治组织，都随时被绑架、谋杀，或成为其他践踏人权行为的牺牲品，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 三、所收到的材料

16. 本部分概述所收到材料对危地马拉违反人权的控诉,主要是指称《世界人权宣言》第3、5、6—11、19、21条和第23条第(4)款所列举的权利受到侵犯。

17. 自1965年以来,危地马拉制订了宪法,保证基本人权。就国际文书而言,危地马拉批准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已婚妇女国籍公约》和《国际更正权公约》。危地马拉还签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1979年5月25日危地马拉还批准了《美洲人权公约》,但对其中第4条保留。在劳工领域,危地马拉批准了1948年的《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第87号)和1949年的《组织权及共同交涉权公约》(第98号)。

#### 第3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危地马拉宪法第43条:“在危地马拉人人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国家保证人类固有的权利:生命、人体之完善、尊严、人身及财产之安全。”

18. 根据这一条而审查的主要情况可概括为:

- (一) 治安部队和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大规模杀人。
- (二) 越来越多人失踪被绑。
- (三) 私刑处决极为普遍。

19. 这些情况从以下各方提供的材料中可见一斑。

(a) 美国政府提供的材料的摘录:

“危地马拉的历史就是充满暴力的历史,发生过多多次非宪法的政变。1980年被绑架、被暗杀的人数超过1979年。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每月平均发生75至100起。据报道,左右两派的武装极端分子和政府保安人员,都搞暴行。危地马拉政府说,它同马克思主义激进派武装组织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1980间,这些组织在

中部高原特别活跃。 1970 年代初期，危地马拉东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叛乱被政府镇压，死亡惨重。 据报道，政府为了打击它所认为的敌人，往往不惜纵愿暴力、使用暴力……危地马拉治安部队已加紧向游击队进攻，企图将之彻底消灭。 无辜人民常成为双方滥用暴力的牺牲者。 暴力是出于政治目的抑或出于私人目的，常常难以区分。 危地马拉政府虽受到压力，却一直不愿宣布总戒严令，暂时取缔某些宪法规定的自由和保护……“ 1980 年暴力的牺牲者包括：军方和警方人员、政府官员、亲政府的政界人士、商人、反对党领袖、农民、以及许多的学生、学者和工会会员。 有不少多学者和反对党人士都因怕被害而自我流亡。 EL Quiche 地区军队同游击队的冲突升级，两名教士被杀，还发生其他一些事件，此后，EL Quiche 的主教即将其教区内的所有教士全部撤出。 另外一名教士在别处被杀，还有一名被绑架。 1980 年 10 月，一名美籍私人农业项目工作者被不知名凶手谋杀。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两名联合国官员、几个危地马拉和外籍企业家，包括 Nestle 驻当地的总经理，并且杀害了主要商会的会长。 1980 年 1 月，估计同游击队有联系的极左学生组织的武装人员带领一些印第安农业工人占领了西班牙使馆，以抗议政府的政策。 警察不顾西班牙大使的请求，向大楼开火，结果三十二名占领者同七名人质全部烧死。 当警察冲进被占领的房间时，至少一名占领者扔了一个燃烧瓶，引起大火。 由于这一事件，西班牙政府同危地马拉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每月平均发生 75 — 100 起。据说，左右两派的武装极端分子和政府保安部队人员，对此都负有责任。 据报刊透露，防犯罪暗杀队每月平均约杀害 13 人。 尽管政府否认，队中据称混有不少保安人员。 在农村地区，常有报导说当地的军事和行政当局、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右翼恐怖主义活跃分子、以及私人团体出于政治和个人目的采取暴力行为，却没有听说政府对之采取

法律制裁。 197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批评，危地马拉政府，说它不调查‘暗杀队的暴力行为和活动。

“危地马拉不听说有政治犯。刑事犯付钱可获得较好的待遇，但一般犯人的待遇都相当平等。 所有监狱都没有医院或诊所。 伙食是通常的危地马拉饭菜。 犯人很容易买到其他食品以补充标准伙食。 犯人在监狱中有相当多的行动自由。 犯人家属探监的时间没有很严格的限制，配偶探监还供单房过夜。

“1980年被绑架的人数增多，而且从此不知去向。通常的估计是：大部分被绑架者已经死亡。在Comalapa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大坑，里面葬有三十具左右的尸体，其他地方也发现过秘密埋葬地点。这些情况证实了上述的估计。 80年6月和8月，不明身份的枪手在左翼劳工积极分子的两次会议上抓走大约44人，后来其中一人的尸体被辨认出来。 危地马拉左翼反对党组织指控政府保安人员。 关于失踪者的调查似乎流于形式。”<sup>2</sup>

(b) 从大赦国际提供的材料摘录如下：

“1978和1979两年之中不断有人向大赦国际报告有关袭击和屠杀农民的消息。 危地马拉农民的苦难于1980年1月31日再次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那天，警军攻击危地马拉城里的西班牙使馆，造成21名Quiché印第安人的死亡。 那天上午，Quiché印第安人农民的一个代表团进入西班牙使馆，求助唤起危地马拉当局重视Quiché驻军滥用权力、不断制造农民亲属‘失踪’事件的行为。 国民警军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出动包围使馆大楼。 尽管西班牙大使Maximo Cajal López和西班牙外交部都要求警军不要进入使馆，农民代表团也答应和平退出，国民警军还是向大楼猛烈开火。

---

<sup>2</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81年2月2日，第441至442页。

结果，38人死亡，有些被枪杀，有的被火烧死，只有大使和一个印第安人农民Gregorio Yuja Xona 得以幸免。因大使坚持，受了重伤的Gregorio Yuja 与大使被送入同一间医院。虽有警察守卫，晚上Gregorio Yuja 还是被人从医院劫走。第二天发现了他的尸体，明显是受酷刑折磨而死。美洲国家组织谴责这次警察袭击，说是‘这一暴力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准则’。

“1980年3月3日，危地马拉军人在Nebaj向排队领取身份证的村民开枪射击，致使15个农民死亡，50—60人受伤。据官方宣称，是村民袭击了兵营，但是目击这一事件的教会人士和外国记者都说是军方开的火。

“除了上述引起世界报刊注意的严重事件之外，大赦国际还不断收到有关农民家庭受到有组织的迫害的报告。大赦国际的报告《危地马拉政府的政治谋杀计划》中载有一篇采访记录，一名农民说，如果被政府在家里发现传单和通告，就可能全家遭殃。1980年4月19日，55岁的Ixil印第安人Juana Tum de MENCHU 从San Miguel Uspantán教区的女修道院回家，途中被巡逻部队拘留。她曾经同Uspantán地区的一个农民代表团外出呼吁，要求释放前一个月被士兵拘留的9个农民。在被拘留前，她曾告诉一名采访者，9人中有一个是她的儿子Patròcino，是在Chimel村他们家里被抓走的（参看大赦国际文件AMR 34/08/80，1980年2月8日）。经过三个月的秘密拘禁后，1979年12月在El Quiché一条路边发现了9名‘失踪者’中7人的尸体。她的丈夫Vicente Menchu 陪同第二个印第安人代表团从Quiché到危地马拉城去。他是1980年1月31日西班牙使馆38名死者之一。Juana Tum de Menchu自己也‘失踪’了，Chimel村里的Menchu一家从此就不存在了。

“El Quiché的农民仍然深受军队在该地区行动之苦。1980年10月15日，士兵们在Chajbal杀害了PU ZEPETA REYNOSO家族的七名成员，其中还有儿童。唯一的幸存者Abelino Pu Zepeta到了危地马拉城，进了罗斯福医院。便衣保安警察跟踪追到，把他抓出医院，1980年10月20日他被谋害弃尸。

“Sololá县的Santiago Atitlán是个有20,000人的城镇，居民大部分是Tzutuhil印第安人。自该镇于1980年10月22日被危地马拉军队占领以来，至少已有27名农民‘失踪’。对此大赦国际也非常关切Santiago Agitlán的一名印第安农民于1980年11月中旬接受过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参看大赦国际文件AMR 34/08/81）。他说，1980年10月23日‘部队在两间屋子里抓走两个农民。他们殴打农民，还打妇女和儿童’。大赦国际最近所得悉的事件是：1981年1月7日，保安部队人员在Santiago Atitlán绑架16人。第二天，在从Suchitepéquez县Patatul通往Escuintla县Nueva Concepción的公路上，发现了Santiago Atitlán七名咖啡工人的受过酷刑的尸体。这七人都是被绑走的。其中三人被认出是：32岁的Pedro SAJUEL MENDOZA, 24岁的Julie MELGAR和17岁的Diego CHAJCOL OUIC”。

大赦国际今天（1981年2月18日，星期三）说，在Romeo Lucas García总统的直接控制下，危地马拉政府正在执行一套预先制定的谋杀和酷刑的行动计划，就以总统府的一所配楼为总部。

大赦国际今天出版了一份新报告《危地马拉政府的政治谋杀计划》报告说，从1980年的1月至10月，大约有3,000人被劫后遇害，数以百计的人失踪。

---

’ 大赦国际，1981年3月12日，大赦国际索引：AMR34/16/81(二)。

危地马拉政府将这些谋杀事件归罪于不属其控制的独立团体。但是，报告提出详细证据，表明是军方和警方所为，并且又提出两份新的旁证材料——一名幸存者和一名退伍士兵的谈话。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批评或被怀疑是批评政府的政策而被危地马拉保安部队杀害。1976年，大赦国际估计，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之中，大约有20,000人在被拘留后遇害或“失踪”它估计，自从1978年Lucas Garcia将军上任总统以来，将近5,000危地马拉人被抓和被杀。深谷、路边或大坑里常发现大量尸体，身上往往留有酷刑的伤痕，大部分是被勒死，被橡皮面套窒息，或是头部中弹而死。

报告说，谋杀计划是由1964年成立的一个总统直辖办事处指挥的，这个办事处设于总统府内，前不久称为地区通讯中心，在这以前还用许多其他名称。

危地马拉当局将杀人事件归罪于暗杀队和反共秘密军，说它们是独立的组织，但是大赦国际说，当局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这些组织确实是独立存在。大赦国际注意到危地马拉出现游击队的暴力活动，但是它说，这不能成为政府谋杀的理由。

新报告中的采访记录载有最近的证词，再次证明保安部队杀人有责。报告说，一个谈话人是1980年危地马拉政治犯的唯一幸存者，描述了他在Huehuetenango军事基地被拘留的情况。他说，他被拘留在该基地11天，这些期间，他亲眼见到三名犯人被杀，还看到其他六人的尸体。另一个谈话人是一名应征士兵。他受过训练后，被派去抓人和杀人。他说，除黑名单上的人以外，部队还有权杀死“任何可疑分子”。

报告报导了一些军队和警察抓人的代表性的案例，其中一些人的尸体后来被发现，另一些人至今不知下落。<sup>4</sup>

---

<sup>4</sup> 1981年2月18日大赦国际新闻稿，大赦国际索引：AMR 34/01/81。

保安部队制造“失踪”事件，非法残杀农民

1981年7月19日Coya 残杀事件

大赦国际最近收到报告：1981年7月19日，军队轰炸 Huehuetenango 县 San Miguel Acatan 市的Coya 村，150至300名农民被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据报导，士兵们还将被害者的尸体堆在一块，用大刀乱劈乱砍。

“1981年6月17日从El Arbolito ‘失踪’的人

Daniel RODAS ALVAREZ

Vidaul ROMERO RODAS

Carmen CRUZ RODAS Y RODAS

Erasmó AGUILAR

Benjamin MALDONADO

“1981年6月17日，武装人员冲进危地马拉最北部 Peten 省 Rio Usumacinta 丛村地区的El Arbolito 农业合作小村。这些入侵者焚烧房屋和庄稼，抢掠财物，劫走了一些人。农民在玉米地里劳动或是在路上不巧撞见这班袭击者及其俘虏，都被立即枪决。一名妇女说，入侵者的头头将一名叫 Manuel 的男子拉了出来，用一枚大针当着他的孩子面前刺盲了他的双眼，然后将他射伤，把他抛入附近河里淹死。

“这些入侵者自称是反共秘密军的人员。但是一些遭受他们酷刑和拷问后幸存下来的农民逃往墨西哥避难，作证说，这些袭击者后来回到离合作村20公里左右的临时兵营，换上军装归队。兵营里的所有士兵都配有流动宪兵队的袖章、正规部队的装备、穿着特种防暴队所专用的有条纹的军装。据报导，这次事件中行凶的是常驻 Poptun 的部队。

“幸存者作证说，自6月17日至24日，他们都被绑住，既无食物又无水，被打、被踢、被烟头烧，还受过假枪决和假绞刑的恐吓，戴过浸满化学药品的面罩。



入侵的士兵们还将橡胶“手套”放在一些农民的手、睾丸、咽喉和胸口上，点火焚烧，直烧到骨头火才熄灭。

“幸存者展示了身上的被烧、被砍、大拇指被绑的伤痕。他们曾听说，同村的其他人也受过类似的酷刑，并且确信一些朋友和亲属已因此而死亡。他们曾听见卡车载着尸体而去；他们估计尸体是被抛进附近的 Usumacinta 河里。

### 其他最近的大规模非法处决事件

“一、据报导，1981年2月的第一周，士兵们搜查 Chimaltenango 地区 Comalapa 市郊 Papchala Patzal 和 Panimac 三个村子，杀害了168名农民，包括男、女、儿童。

“据说，受害者中有一个诞生不久的婴儿，被活活踢死，母亲也遭杀害。据说，受害者的尸体用卡车被运往秘密坟地，数天后，因尸体腐烂发臭，引起人们注意，才发现埋尸地点。1981年5月7日《纽约时报》报导了这一事件。《时报》说，这一屠杀事件是在当地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和援助人员报告的，但是后来这些人被迫离开该地。

“二、据说，1981年2月4、5、6日，士兵搜查了 Chimaltenango 地区 San Martin Jilotepeque 市郊的 Las Lomas 镇，在一卡车上用乱枪扫射村民，杀害了将近85名男、女、儿童。据报告，士兵们焚毁房屋和庄稼，把一些妇女的尸体吊在树上，掠夺死者身上的财物。据说，逃跑的人还遭到飞机轰炸。Chimaltenango 是1976年危地马拉地震损失最惨重的地区，从国外获得救灾物质和社会援助最多，因此出现了一些强大的社会组织。危地马拉当局将这些组织看成是反对现政府的政治中心，因而在这个地区的镇压行动也特别残酷。许多近几个月被杀害的人曾经收到过反共秘密军的恐吓信。反共军自称是右翼“暗杀队”，但是大赦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政府保安部队人员掩盖身份的幌子。他们执行官方的命令，但搞谋杀和绑架时往往穿的是便服。2月份的几次事件都是在据说游击队经过小镇后发生的。

“三、1981年3月，Chimaltenango 再遭镇压，两周内171人被杀，43人被绑架“失踪”，16人受伤。在3月8日至15日一周内，军队从 Quiche

县 San Miguel Uspantan 市的 Calante 村抓走 9 名农民。3 月 17 日，士兵们又到 Calante，抓走留在村里的男人和妇女。第二天，在从 Calante 到 Uspantan 的路上发现了 15 具被砍头的女尸。3 月下旬，据说在 Peten 省通往 Melchor de Mencos 的公路上以及与伯利兹交界之处的 Macache、La Union、El Cruzadero、El zapote 等村庄，都遭到类似的袭击。据报导，实际上这些村庄目前已无人居住，因为村民们有的被烧死在屋里，有的被抓走，后来发现尸体，满身酷刑伤痕，并且惨遭肢解。

“四、1981 年 4 月 9 日，60 名保安部队人员开进 Chimaltenango 地区的 Chuabajito 村，据说杀害了至少 23 人，包括一个 5 岁的儿童（参看大赦国际文件 AMR 34/22/81 和 AMR 34/24/81）。事件发生的傍晚 7 时半，一群人从树林里走出来，带着从附近村里抓来绑着的 12 个人。这些入侵者戴着面罩，到 Chuabajito 村指名要人。他们抓了村里 12 个男人，有的是 19 岁的少年，有的是 50 多岁的老人。当这些人被赶向一所学校时，其中一人的女儿追来，结果被乱刀砍死。下午 8 时半，留在村里的人们听到机关枪响，他们鼓起勇气到山下去看，发现 22 人被枪杀。其中一人的咽喉被割，据说当时还活着，不久就死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日报》4 月 14 日报导说，当时还有其他两人尚未死亡，一个是 53 岁的 Esteban Loves，另一个是 31 岁的 Santos Mayuirre；他们被送到 Chimaltenango 的县医院抢救。该报导文章说，这两人的头部和咽喉被砍伤，当时已不会讲话；医生们为救他们的生命，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大赦国际的医疗小组曾代表这两个幸存者向危地马拉政府发出呼吁（参看大赦国际文件 AMR 34/26/81），但是后来他们的去向和命运如何，一直没有得到消息。一周之后，危地马拉军方发表一项声明，对在这个村里发生的不人道的惨剧表示关切，说什么这个村子没有得到治安部队的保护，并答应将进行调查，以查明这一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凶手。似乎调查只限于访问幸存者，而且据村民们报告，自从事件发生后，他们没有看过任何士兵或警察。

“同时，1981 年 5 月 25 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说，美国政治评论专栏作者杰克·安德森得到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机密直通电报。美国驻危地马拉城大使馆的官员们在电报中表示，他们非常怀疑是右翼暗杀队同军方共谋，一起进行

屠杀的。据报导，直通电报说，军方将事件归罪于游击队‘令人难于置信’的。该电报还说，游击队不会这么大规模地杀人，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到农民的屋子里去搜查武器。电报还说，如果是游击队袭击了村庄，并想嫁祸于政府的话，他们应当会穿上军装的。

“五、1981年4月11日，在危地马拉城以西65公里处的孤立小村Chinanba里，有24名农民被杀。危地马拉政府又将这次屠杀事件归于颠覆分子，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对这事件作了调查。

“六、1981年4月15日一些士兵来到Quiche县Nebaj市郊Cocob村，杀了9名收工回家的农民。第二天，那些士兵又到Cocob，将留在村里的60人尽数杀害。受害者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七、1981年5月24日，一支穿便衣的部队在一名中尉的指挥下来到Quiche县San Juan Cotzal市郊San Francisco庄园。据说，他们检查了庄园中成年人的身份证，强迫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行，然后开机关枪向他们扫射。70人当场死亡，许多人受伤。San Juen Cotzal市的居民在这以前也遭过大规模屠杀。1980年7月，游击队进攻一个兵营，打死了4名军官和40名士兵。游击队撤走之后，政府部队从附近的城镇赶来。他们把市里的老百姓赶到中心广场，杀死了60人。据说，士兵们在撤走之前还警告说，如果以后发生类似情况的话，他们要杀死60名妇女和60名儿童。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1980年7月，部队人员坐着卡车、吉普车和直升飞机占领了与Quiche县府相距约15公里的La Estancia村。据报导，军队对4名农民当众用刑，并加以杀害。报告说，在这4名受害者中，2名是叫Chavez的兄弟两，另外两人名叫Morales和Tzoy。军队用竹签插进他们的肛门、耳朵、咀和眼睛，然后将他们在家人面前活活烧死（有关1980年军队在Quiche县Nebaj杀害居民的情况，请参看大赦国际文件AMR 34/17/80；有关1978年5月军队在Panzos和Alta Verapaz进行屠杀的情况，请参看AMR 34/11/79）。

“八、另一次事件发生在墨西哥边境，1981年6月1日午夜刚过，Hueluet-enango县San Mateo Ixtatan市郊Huaxix区遭到袭击，据报告，至少36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5人重伤。受害者中包括8个从5岁到10岁的

儿童。 一群据说是危地马拉军队士兵的武装人员乘车开进 Huaxix 区到小镇边缘几间土房前破门而入，用机关枪向内扫射 15 分钟后离去。在发生这一事件前不久，另一些武装人员经过该区，在墙上涂了反政府的标语。 屠杀发生以后，两名士兵来到镇上，草草查访一番。”<sup>5</sup>

(c) 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提交的指控的节录：

#### “杀害妇女和儿童

1980 年间，许多妇女遇害，其中有的是危地马拉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如，丽塔·纳瓦罗，艺术系毕业生，教授；瓜达卢佩·纳瓦斯，大学教授，律师；卢西拉·罗达斯德比利亚格拉，克萨尔特南戈妇女协会主任。 诗人瓜达卢佩·纳瓦斯是于 1980 年 8 月 30 日遇害的。

1980 年 11 月，在圣路易斯乌里奥拉庄园，发现一位 30 岁妇女的赤裸尸体，尸体上留有明显的受酷刑的痕迹。 她的双手被砍去，脸上留有許多伤痕，已无法辨认。

7 岁女孩胡里塔·帕特里西亚·利纳雷斯，在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对她 65 岁父亲何塞·埃克托尔·利纳雷斯进行机枪扫射时，遭杀害。这件事发生在莫尤塔胡蒂亚帕区内，当时约有八个身份不明的人带着冲锋枪来到利纳雷斯先生的家里，企图绑架他。

#### 全家遭屠杀

1980 年 11 月，在圣胡安德奥斯吞卡尔科区，有三户农家遭屠杀。约在星期六午夜至星期日拂晓之间，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他们简陋的家中，用火器和刀子残酷地杀害了罗萨尔福·沙隆索·莱昂，45 岁；贝尔纳维拉·巴斯克斯·罗梅罗，40 岁；胡安娜·华雷斯·

---

<sup>5</sup> 大赦国际，1981 年 8 月 25 日。大赦国际索引：AMR 34/39/81。

佩雷斯, 25岁; 马科斯·阿隆索·维森特, 45岁; 维克托·阿隆索·罗梅罗, 18岁; 帕维罗·阿隆索·罗梅罗, 15岁; 弗朗西斯科·阿隆索·罗梅罗, 8岁; 安赫尔·阿隆索·华雷斯, 11岁; 胡利亚娜·阿隆索·罗梅罗, 7岁; 塞西利亚·阿隆索·华雷斯, 6岁; 以及贝纳达·阿隆索·华雷斯, 10岁。 这些恶棍放火烧了其中的两家, 然后逃去。

1980年12月, 在哥打佩克区的帕尔米拉庄园55岁的菲德利娜·比利亚托罗及其三个女儿奥拉·埃伦娜·比利亚托罗, 30岁、阿梅莉亚·桑塔伊·比利亚托罗, 17岁和阿莉西亚·桑塔伊·比利亚托罗, 9岁, 遭到残酷杀害。

在洛斯阿隆索斯德克萨尔特南戈村里, 有12个人, 包括七名儿童, 被处死。

还有许多报告提到了杀害印第安人的事件, 例如, 在夸切·伊西尔、凯克契和里奥内格罗一带, 印第安人农民的家属和团体因极力阻止军队掠夺他们的土地而遭杀害。

### 秘密墓穴

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在危地马拉的各个地方发现了多处秘密墓穴, 里面埋藏的尸体残缺不全, 可以看到死者身前受到酷刑的痕迹, 其中有些尸体的外形已遭毁, 以免让人辨出受害者是谁。

已经发现的事件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在科马拉帕和奇马尔特南戈地区, 发现了一个秘密墓穴, 其中藏着用塑料袋包裹着的12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在胡蒂亚帕, 发现了另外一些无法辨认的尸体;

在克萨尔特南戈行政区内, 在一个秘密墓穴中发现了50多具尸体。

在萨卡帕, 发现了一个秘密墓穴, 里面埋着42具残缺不全的尸体。<sup>6</sup>

---

<sup>6</sup> 参看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1981年8月18日的信函。

(d) 国际人权联合会提出的控词摘录如下：

“危地马拉并未公开承认处于内战状态，这点它与萨尔瓦多不同。然而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前半年的死亡数字为每天30人，‘被劫失踪’或‘被非法监禁’的人数每天达10多人，也就是说，六个月内死者5,000人，失踪者1,500人。首先必须指出，上述统计数字应视为最低数字，因为它们是抄自当地报刊的，而当地报刊所登载的数字总是低于实际数字（法国大使馆有关部门的研究）。再者，这些数字只包括遭受杀害的平民，不包括政府军与游击队在多次冲突中的伤亡数字。

“各阶层的人民都遭到这种被杀被劫的命运。农民和印第安人首当其冲，但是基督教团体、教士、修士和修女、工人、法律界人士、知识份子、教员等也都难逃厄运。最近三年来，被杀或失踪的律师达70人，教士和修士也遇害或失踪者也有数人（1980—1981年为7人）。

“行凶者难以确定，多数是准军事团体，有时是军队（例如，1978年5月军队在Panzos杀害了100名Kekehi印地安人），也有时是保安部队（1980年1月保安部队攻击西班牙大使馆，杀害了30名农民）。

“新闻通常报导：城里或田野中发现尸首，身上无身份证，“凶手”不明。

“必须指出，准军事团体的行动是政府当局知情的，其中不少是负责治安的警士”。<sup>7</sup>

(e) 世界教会理事会的控诉说：

“值得指出，左翼受害者对右翼受害者的比例约是10比1”。

分析又指出，“有201宗‘公开的绑架’，大多数有全副武装的人参加，有时还穿着制服。

---

<sup>7</sup> 国际人权联合会1978年8月26日关于危地马拉的声明。

“寻回的434具尸体留下毒刑和（或）残害肢体的痕迹，有483具尸体身份不明（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关于尸体认领的消息尚未见报）。

“根据国家警察的官方数字，1979年头十个月有3,240人被暗杀，并留下毒刑的痕迹。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1979年的总数，那么差不多比1966—1976年的估计数字增加一倍。

“‘1979年危地马拉的暴力事件’一文单是采用报纸的报导，就得出1980年以前增加的以下数字：

“1978年1月至6月 Pres. Laugerud 每月62名受害者

“1978年7月至12月 " Lucas 每月84名受害者

“1979年1月至12月 " " 每月114名受害者

“1980年的数字显示，受害人数有增无减。根据某方的报导，在8月11日至25日这两个星期，共有342人死亡。某方又报导，该年初平均每月有205人死亡”。<sup>8</sup>

(f)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的控诉摘录如下：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加拿大）自1978年以来即对危地马拉的人权状况进行密切的监查。1980年，委员会派出两个调查团到危地马拉，在首都及郊区搜集关于侵犯人权的第一手证据。委员会成员又同一些应教会组织邀请于1980年访问过加拿大的危地马拉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在会谈时获得的资料包括反对镇压民主阵线五人代表团于5月到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时所作的证词。这五人同外交部官员、代表联邦三个主要政党的议员代表以及教会、工会领袖会见时，就危地马拉当局对本国人民有计划使用的恐怖手段提供了详细的证据。

“教会间委员会从多方面搜集的证据使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估：在以罗米欧·卢卡斯·加西亚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的统治下，危地马拉

---

<sup>8</sup>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危地马拉对人权的侵犯行为”，1980年10月第19页

1980年的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目前，每天有三、四十人受害。是危地马拉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全国性的镇压浪潮。

### 恐怖气氛

“在1980年1月／2月和7月访问过危地马拉的教会间委员会成员说，该国为明显的恐怖气氛所笼罩。1月底，我们访问了四名从基切到首都的农民；他们要求官方对军队占领基切、残暴镇压基切人民的事实进行调查。我们会见的其中两名农民翌日——即1月31日——，在西班牙使馆的大屠杀中被害。这次屠杀夺去了39人的生命。尽管西班牙大使Maximo Cajal y Lopez曾要求危地马拉政府不必采取行动，因使馆内无人受到威胁，但危地马拉警察还是进行这场屠杀。我们从电台上听到、从电视广播上看到、从报纸上读到政府对当天事件的歪曲报导。我们参加了被杀害的农民的送葬行列，沿途亲眼看见警察及全副武装的便衣人员（使用蒙上车牌的车辆）密布于盛大送葬行列经过的所有街角；有五、六千人参加了葬礼。

“在7月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我们注意到恐怖气氛明显加剧，市区街道上和郊区到处出现大批的警察和军人。我们同教会人员、人权拥护者、社会发展工作者、农民和民间团体领袖进行的会谈，几乎全部是几经艰辛才安排得到，因为很多人经常受到监视。要会见工会领袖或San Carlos国立大学的教授、学生简直不可能，因为在1980年头六个月，工会和大学方面被绑架和暗杀者有增无减。在这段期间，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或受到经常监视，使生活和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数十名同加拿大教会机构建立了长期关系，而且也是教会间委员会成员亲身认识的人士，都被迫出国流亡。



### 西半球侵犯人权的首恶之一

“危地马拉蔑视生命的权利及其他一切基本人权，显然是1980年西半球侵犯人权的首恶之一。失踪、暗杀、生命威胁、拘捕、打击工会活动、屋内扫荡、抢占贫农(大部份为土著人民)土地、袭击教会人员和财产，袭击学界和新闻界人士，所有这些都是对这个中美洲国家实行的暴力的一部分。根据设于华盛顿的一个人权监测组织——美洲半球事务委员会——估计，1980年有5,000人以上被杀害；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其他资料来源认为死亡人数是每天15至20人。但由于报导披露有土著装束的身份不明的尸体随着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之间的河流漂流而下，并发现几个集体坟地，另一些消息来源认为死亡人数更多。举个例子，据报1980年5月，在Chimaltenango的San Juan Comalapa附近的一个深谷，一些学生搜索不久前被绑架的当地居民Neemias Cumes时，至少发现了26具尸体残骸。发现的尸体留下毒刑的痕迹。报章以前曾多次报导在该国几个地方发现秘密坟场。此外，约在那个时候，基切的Chicoy河被称为另外的秘密坟场，因为河里每日都发现顺流而下的浮尸。这些浮尸至今身份不明，且带有子弹伤痕。

“1980年，以前的一名危地马拉政府官员作出惊人的透露，表示在所谓独立的半军事性暗杀队的行动中，有危地马拉政府和军方高级人员的参与。1976年至1980年中担任内政部长Donaldo Alvauz Ruiz新闻秘书的Elias Barahone y Barahona在向巴拿马寻找庇护时召开记者招待会透露，他实际上是打入政府内部的贫民游击队(Ejercito Guerillero de los pobres)队员。Barahona的告时指控说，危地马拉政府应对1980年1月31日的西班牙大使馆屠杀案直接负责。他说卢卡斯·加西亚总统亲自下令袭击西班牙使馆、以及翌日政府官员编造官方对事件的说法时，他本人都在场”。

---

<sup>9</sup>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1981年1月22日，第53至55页。

第五条：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亦不得加以肉体或精神的虐待、耻辱的刑罚或行为、艰苦或压制……”

危地马拉宪法第五十五条。

20. 审查的材料中包括大量关于违反第五条规定的控词，特别是残忍的处决方法，以及大量关于酷刑的报导，特别是：

- (一) 对犯进行各种方式的毒打和肉体虐待；
- (二) 残害肢体；
- (三) 以残忍和野蛮的方法进行未经法律程序的处决。

21. 以下是说明上述例子的一些摘录：

(a) 美国政府提出的控诉摘录如下：

“关于侮辱性的待遇、滥捕和未经法律程序的处决等侵犯人权的行为，经常有人提出控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对政府、政府盟友和商业利益加紧采用暴力行动的农村地区。危地马拉保安部队已加紧努力消灭游击队。无辜者常常成为双方滥施暴力的牺牲者。要区别怀有政治动机的暴力和怀有私人动机的暴力常常是不可能的事。宪法第五十五条和刑事程序法第十条均禁止酷刑。据报政府保安人员实行酷刑和其他无理和不公正的待遇。据危地马拉报纸报导，暗杀的牺牲者身上常常带有受过酷刑或残害的痕迹。没有任何证明显示参与这种做法的任何人受到处分。”<sup>10</sup>

(b) 国际人权联合会的材料摘录如下：

“所发现的尸体通常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施刑痕迹仍清晰可见。一般拷问必施刑，而且往往致命。澄词难以收集。然而，我们曾遇到了一位 Qui che 的年青农民。他与四位同伴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日夜拷问（被蒙住眼睛、长时间站立、受电刑、火烙、心理折磨等等）最后逃脱。

---

<sup>10</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81年2月2日，第441和442页。

“1965年的宪法第79条规定了人身保护法，叫‘移送法办’。但是该条的规定，同1973年禁止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的法令一样，从未见实施。警察发现尸体或接到失踪报告从不认真调查。法官也表示无能为力。二十年来，只在1978年破过一宗失踪案。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危地马拉没有任何政治犯，因为政敌已全被暗杀”。<sup>11</sup>

(c)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提出的控词摘录如下：

“受毒打的农民

“在同一时期，军队多次侵入San Martin Jilotepeque市。士兵们搜查房屋、翻箱倒柜，询找农民团结委员会的领导者。为了寻找军人名单上那些农民，他们绑架了六个农民，对他们施刑达四天之久。

“9月30日上午9点，几名便衣侦探在10名身穿制服的警察的陪同下到Parramos一个农民家里，指控这户人家制作炸弹。他们又到邻居指控那家人私藏武器。他们发现户主不在家，将妻子和孩子痛殴一顿，抢走了家人制造的手工艺品、家中的钱和一部打字机。

“Kai Yutah Clouds(又名Veit Nirolaus Stoscheck)被绑架、受刑以至死亡的事件涉及加拿大，因为他是一个曾在加拿大居留、并在那里工作过的美国公民。这人32岁，是教友派(公谊会)的积极分子，抱着非暴力的信仰。他在危地马拉同当地人一起从事天然虫害控制和有机耕作方面的工作。证人的报告说明10月10日下午1:15左右，在距离Viuhage's central Park 100公里的Chimaltinango，五名全副武装的便衣人员(据报为保安部队人员)将他绑架，用枪敲昏他，把他拖进一辆红色的Honda Civic型汽车(保安部队常用的那种)。后来在Antigua城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有多处伤痕；估计死亡时

---

<sup>11</sup> 国际人权联合会1978年8月26日关于危地马拉的声明。

间是10月11日清晨4点。 ”<sup>12</sup>

(d) 大赦国际的控词摘录如下:

“幸存者作证说,自6月17日至24日,他们都被绑住,既无食物又无水、被打、被踢,被烟头烧,还受过假枪毙和假绞刑的恐吓,戴过浸满化学药品的面罩。 入侵的士兵们还将橡胶手套放在一些农民的手、睾丸、咽喉和胸面上,点火焚烧,直烧到骨头火才熄灭。

“幸存者展示了身上的被烧、被砍、大拇指被绑的伤痕。 他们曾听说,同村的其他人也受到过类似的酷刑,并且确信一些朋友和亲属已因此而死亡。 他们曾听见卡车载着尸体而去;他们估计尸体是被抛进附近的 Usumacinta 河里。 ”<sup>13</sup>

第6条—第11条: 关于在法律前承认人格,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权、有效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留或放逐的自由、受到公正和公开审讯的权利及被视为无罪的权利:

“每人有到法庭根据法律行使起诉权的自由。

“外国人只有在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时才可利用外交渠道裁决如对外国人不利,不可即视为不公正,首先还应尽力设法通过危地马拉法律的上诉程序解决问题。 ”

“任何人如受到非法监禁、拘留、或其个人自由受到其他约制,如受到失去个人自由的威胁,如虽被合法监禁或拘留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不论是为要求恢复自由、纠正不合理待遇、抑或终止其所受的制约,都有权向法庭提出申诉。如法庭宣布释放被非法监禁之人,应当适当地立即给予他自由。 如被监禁之人提出要求,或者法官或法庭认为适当,应在其所在之处进行审讯,而不必事先通知当事各方。已要求取得人身保护令的被拘留者必须亲自上庭。 官方人士如下令隐藏被拘留者,或拒不准其上庭,或以其他方式妨碍上述保证的实现,应同执行命令的人员一起视为犯有劫持罪,按法律受到制裁。 ”

<sup>12</sup>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1981年1月22日,第65页。

<sup>13</sup> 大赦国际,1981年8月25日。A T INDEX: AMR 34/39/81。

“任何人在下列情况中有权请求宪法保障：

1. 为维持或恢复宪法规定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保证；
2.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为要求法庭裁决由于一项法律、规章或某当局的决定或法令违背或限制了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因而对请求宪法保障的人没有约束力。”危地马拉宪法第74、79和80条。

22. 尽管法律体制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提出的材料指出，由于法官和律师们都受到威胁，司法制度没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人们被准军事组织逮捕，投入监狱，受到酷刑，仿佛没有法律保障一样。

23. 上面的控词摘录载于下列材料之中：

(a)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宪法第53条规定了法庭对被告人起诉的适当程序。被起诉的人一般都能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判。法庭不受行政或军事当局的控制。低级法院的法官。由立法机构选举出的最高法院法官任命。根据危地马拉法律，初审必须在拘押后48小时之内进行，在初审提出正式指控之后，律师才可与当事人联系。如果被告人没有私人辩护律师，则由法庭指定一个律师为其辩护。

“宪法第259条规定，除在紧急状态下，军事法庭只有对领导武装行动、反对当局的公民，才有审判权。军事法庭的组织、成员和职能都是根据军法而定，由普通立法加以补充。近年来，没有出现普通公民受到军事审判的案例。同民事审判一样，犯人可以就军事法庭的判决向高级民事法庭提出申诉。

“虽然有着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法官、律师当事人及证人所受的威胁，司法制度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暴力报复的威胁，判罪的情况不多。1980年有三名法官和至少六名律师被谋杀，看来他们正是这种报复行动的受害者。国际法学家

委员会1979年的报告指出，准军事组织的行动使人们无法信任司法机构和法治。”<sup>14</sup>

(b)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1980年8月24日，十七名工会领导人和一名天主教负责人在危地马拉南海岸 Escuintla 教区的避静所 Emaus medio Monte 庄园举行讨论会时被绑架。政府声称既不知道也未参与这一大规模绑架行动。但是教会间委员会根据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是政府直接插手。这一行动是由国民警察副探长 Alfonso Ortiz 指挥士兵进行的。工会会员们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进入几辆政府保安部队的汽车（两辆汽车有政府牌照：P—78165、P—78077）。工会会员们被带到危地马拉城的国民警察侦探队车库，在那里，他们在新上任的国民警察总探长 Pedro Arrendondo 指挥下受到酷刑毒打。Escuintla 教区的 Mario Enrique Rio Mont 主教谴责这一事件，指出政府要对这次绑架事件负责。主教发表了谴责之后，数次接到了生命威胁。”<sup>15</sup>

(c)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提出保护人身的要求往往并不能得知政治案件中“失踪人士”的下落。虽然有迹象表明司法当局是在执行这些措施，但没有保安部队的合作，他们是毫无办法的。”<sup>(1)</sup>

“大赦国际同一份报告引述了一个案例，指称在阿拉纳·奥索里奥任总统时，一个被拘留的政治活跃份子多次提出人身保护的要求，但都未能奏效。在一个星期里，每当司法机关按例探视拘留所的时候，当局就把他绑起藏在运货汽车里，开车围着危地马拉城兜转。

---

<sup>14</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81年2月2日，第443页。

<sup>15</sup>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1981年1月22日，第58页。

“大赦国际后来一份报告(2)又提到197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可看出情况似乎恶化了,因为现在连司法部门本身也无视宪法的规定了。

“劳工律师 Yolanda Urizar de Aguilar 十六岁的女儿 Yolanda de la Lus Agiular Urizar 与一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受到毒刑,因为她们散发传单,抗议工会领袖 Miguel Angel Archila 被暗杀一事。在她被捕的7个小时里,大约为她提出了四十份人身保护状,全部被否决。”<sup>16</sup>

- (d)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出关于针对危地马拉法律职业人员的暴行的材料如下:

“就危地马拉律师和法官被袭击事件致美洲间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就危地马拉律师和法官被袭击事件  
致美洲间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维护法官和律师独立性中心自1978年成立以来,收到不少关于危地马拉法律界人士遭遇暴行的报告。最近收到的资料表明1980年末至1981年初,又有十五名律师、法官和法律界人士失踪或被暗杀。也就是说,自1980年1月至1981年1月,在危地马拉被暗杀和失踪的法律界人士共有三十五名。

“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前一年所报导此类事件的数字。这一系列行动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在拉丁美洲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必然会严重地影响法官和律师以无畏、独立精神履行其职业义务的能力,严重地影响到公民通过司法制度证实其公民法权的权利。

“这一系列暴力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受害者的职业类别。受害者中有各种律师,但以从事劳工法、在代表农民组织和印第安人组织的大学‘律师会’工作的律师首当其冲此外,至少有些事例也明确表明,法官们由于其职业活动也日益成为被狙击的对象。下附名单所列的 Maroquin Viuegran、Valjez 等几位法官在1980

---

<sup>16</sup>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危地马拉对人权的侵犯行为”,1980年10月,第9和10页。

年9月被暗杀，就属此类情况。这说明进行这些活动的人有意要使社会某些方面的人士不能切实地享受危地马拉律法所承认的权利，并且有意阻止司法部门公正地行使其权利。

“从下附名单的案例可以看出这些暗杀和失踪事件一般发生在白天，常常是在市区或近郊区，用的手法大同小异。据我们所知，本文提到的案件中肇事者没有一个被捉拿归案，这就证实了一再被人提出的指控：这一系列狙击行动是得到保安部队的默许，甚至合作的。

“近期的暗杀和失踪事件如下：

Jaime Rafael Marroquin Garrido,危地马拉城的刑事法官，1980年9月9日被暗杀。那天下午2时45分他开车驶过首都时被开枪打死。据说这位法官正在审理一些很敏感的政治案件，早已得知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据了解，他并未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也未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Cristobal Arnulfo Viuagran Dieguez, Marroquin法官的法律助理，死于同一次暗杀事件中。

“Hector Augusto Valdez Diaz, 54岁，同一法庭的法官，于1980年9月16日被暗杀，他原定于那一天接管曾由法官Mrroquin审理的案件。法官Vldez在早上7点开车去上班时，凶手乘一辆小汽车和一辆摩托车用机枪将他射死。

“Fulgencio Napoleon Rivas Herrera, Huohuetenango城一位知名律师，也是于1980年9月16日被暗杀。晚上他在关闭办公室时，两个人乘汽车到他身旁用机枪向他狙击。

“Cesar Augnsto Santallana Hernandez, Escuinla的治安法官，1980年9月24日被一群武装的人绑架。

“Ricardo Galindo Gallardo, 律师，据说于1980年10月6日从巴拿马乘飞机抵达危地马拉城后失踪。关于此案没有任何其他材料。

“Padlo Emlilio Valledelapena, 著名劳工律师，1980年10月10日被暗杀。在危地马拉城郊区，有人乘一辆小汽车驶



过用机枪向他狙击。

“Rodolfo Montoya cuzman, San Galos 大学 Escuintla 分校法律顾问处的律师, 1980 年 10 月 17 日被暗杀。他在家中当着妻子及三个孩子被人用机枪射杀。

“ Rigodelto Aroche, Escuintla, San Jose 的治安法官, 1980 年 11 月 16 日发现他被勒死。

“ Leonel Roldan Saegner, 42 岁的社会科学家, Sanluis 大学法律系任教授, 1980 年 11 月 17 日, 他在首都开车去上班时被绑架。和他同行的妻子在那次事件中被机枪打死。十八天后, Roldan 教授的尸体, 在离首都几公里外的公路上被人发现身上带有多处弹伤和受刑痕迹。

“ Miguel Angel Currichiche Gomez 在 Chimaltenango 和 Guatemala 城市开业的律师, 198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 点在首都驾驶汽车时被人用机枪暗杀。在袭击中, 同车的他的十四岁的儿子和另一个人也都被打死。 Churrichiche 先生是 Comalapa 一个土著人协会的律师。

“ Gilberto Jimenez Gntierrez, 法庭总监, 1980 年 12 月 12 日在危地马拉城被暗杀。在担任总监之前, 他曾私人开业, 作过民事法庭的法官并担任过危地马拉最高法院前院长的机要书记员。被暗杀时他作为总监已停职一段时间, 停职原因未被公布。他在下午 1 点开车回家吃午饭时, 被几个乘坐小型运货汽车的人用机枪狙击, 他的司机也同时被打死。

“ Augusto Sac Necancoj, 一位七十岁的律师, 1980 年 12 月 16 日在 Quetzaltenango 被暗杀。在从法律办公室回家的途中, 他的汽车在公路上被截, 他被人拉出汽车枪杀 Necancoj 先生曾与联合执政党之一的革命党有过联系, 但他近年来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他是土著职业人员协会的成员。

“Saul Najarro Hernandez，开业律师，1981年1月21日早上到达他的位于首都中心的办公室时被暗杀。目击者说凶手企图绑架他，但他竭力反抗，中九弹。Najarro先生曾作过法官，被暗杀时正在办理几起重要案件，曾得知有人威胁要杀害他，而且新闻报导表明他曾要求警察给予保护。

“Abel Lemus Veliz，一位四十五岁的律师，1981年1月27日中午开车进入首都被暴徒驾车赶上开枪刺杀。Lemus先生是一名活跃的民法及刑法律师，也是社会民主党（FUR）的工人和农民事务秘书。

“近期的暴力行动还有1980年11月7日前后企图在Mazatenango绑架律师Fredy Rolando Rios Cifuentes的事件，1980年12月28日前后打伤Chimeltenango的治安法官Oscar Armado Gomez Gguproa的事件，以及1980年末企图在Chimeltnahgo暗杀法学生Ehezr Nehemias Cifuentery Cifuentery的事件。<sup>17</sup>

第19条：关于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权利

“可以不经事先检查而自由发表意见……”危地马拉宪法第65条

(a)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其宪法保证了言论、书报和信仰的自由。但是政治性暴力行为

---

<sup>17</sup>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维护法官和律师独立性中心，第7号公报，1981年4月第45页。

盛行的趋势阻碍言论自由。泛美报联社对于影响新闻活动的不安定的局面表示关注，各地方新闻联社对暴力行为深感遗憾，1980年十几名带有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职员成为暴力行动的受害者。对于他们死亡事件的调查事实上都没有确定的结论。尽管如此，报纸和广播常常在没有检查、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批评政府官员和政策，继续收费刊登、广播激进左翼反对派的公报并且在新闻报道中提出反政府的言论。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止公演美国电影‘Norma Rae’，这是一部描写美国南部组织工会的片子。”<sup>18</sup>

(b) 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提供的材料的节录：

“1980年10月16日，记者伊尔马·弗拉克尔就在首都的中心遭到一队全副武装的危地马拉政权的准军事部队人员的绑架。当时，她的儿子，23岁的费尔南多·巴列和她在一起，但在他试图保护其母亲时，被机关枪扫死。伊尔马·弗拉克尔至今下落不明。

阿莱德·福帕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和教授，她于1980年12月19日清晨遭绑架。她为探望生病的母亲从居住国墨西哥来到危地马拉。目睹者说，她是在她汽车里同她的司机阿赫顿·切罗伊一起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绑走的，绑到什么地方不清楚。她至今下落不明。

一位13岁的女学生，索伊拉·奥尔维莉娜·莫拉莱斯和她母亲，48岁的帕特里西亚·拉莫斯·戈麦斯一起于1981年1月遭绑架。绑架后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在离他们家几码远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sup>19</sup>

---

<sup>18</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81年2月2日，第445和446页。

<sup>19</sup> 参看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1981年8月18日的信函，第4页。

(c)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在今天的危地马拉，言论和新闻自由在最残暴的手段下受到严重威胁：批评政府的新闻界人士都受到威胁，如果不理会警告，则往往被暗杀。单在1980年的头八个月，就有13名报纸和电台记者被暗杀，另外3人“失踪”，最后的一次露面是在警察拘留期间。每一个这些受害者以前曾受到警告，叫他们停止发表抨击危地马拉政府的报导。此外，1980年5月以后，有十多名新闻界人士，包括新闻记者、电台经理、广播员及新闻学教授。在收到死亡威胁以后，逃出了危地马拉（参看国际大赦，AMR34/41/80，1980年8月27日）。

“对新闻界采取的这种暴力行为再次说明，为了压制批评意见和报导危地马拉现况的新闻来源，镇压范围越来越广，镇压者走向极权，执意封闭民主的喉舌。

“根据教会间委员会从可靠来源获得的资料，我们挑选出四宗暗杀新闻记者的案件，以说明对新闻界采取的镇压方式；所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1980年10月：

“\* 10月24日，设在Santiago Atitlan的‘Atitlan之声’广播电台经理Gaspar Culan在家中被架走，受到酷刑后被杀害。这个广播电台获得基督救援助组织、世界大学服务社、灭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支持，用当地的印地安人语言广播教育性的节目。Culan的杀害是在军事占领Santiago Atitlan期间发生的。

“\* 电台广播员Felipe Zapeta于Santa Cruz del Quiche县城被绑架和杀害。Zapeta是用基切印第安语言广播的。

“\* 新闻记者Victor Hugo Pensamiento Chavez是几家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他在离开El Progreso邮政局时被枪杀。他以广泛和翔实报导关于企图侵占Santa Maria Xalapan的印地安人土地的新闻见称。

\* Irma Flaquer, 一名初在《时报》工作、最近在《民族报》工作的、名闻整个中美洲的新闻记者, 于10月16日在危地马拉城闹市被枪击伤后被绑架。当时她和她23岁的儿子 Fernando Valle Flaquer在车内驾车行驶, 政府的便衣特务开车从旁边经过用大口径武器向他们开火。她的儿子当场遭枪杀, Flaquer夫人被架走, 至今下落不明, 疑已遭不测。数月前, 她被迫辞去《民族报》副编辑的职位, 因为在此以前, 她受到不断的骚扰, 包括几次的恐吓。有一次她在进行采访工作时几乎为国家警察绑架。在她抨击 Carlos Arana Osorio将军后, 有人在她汽车内放置炸弹, 她被炸重伤。Flaquer夫人是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创始人, 并担任该委员会的协调员, 直到7月19日她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宣布解散该委员会止。因为危地马拉政权采取残暴的镇压手段, 阻挠委员会成员执行职务, 使委员会失去其功能。”<sup>20</sup>

第21条 : 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这条规定投票权普遍、平等, 用不记名投票方式, 定期认真地举行选举

“公民具有下列的固有权利和义务:

1. 选举和被选举
2. 担任公职
3. 自由和有效的投票权、公正的选举程序

普遍、不记名的投票权, 对有文化的选民是强迫性的, 文盲选民则可以自由选择。

国家保证符合民主标准和原则的政党有建立和活动的自由。

如果建立的政党或组织提倡共产主义思想, 或如果其理论倾向、工作方法、或国际联系威胁到危地马拉国家主权或其民主结构的基础, 则应予禁止。”

---

<sup>20</sup>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国际委员会的报告第63和64页, 1981年1月22日。

危地马拉宪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

(a) 美国政府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在过去二十年中，危地马拉政治大部份时间为军人所主宰。但宪政体制规定选举。最高级以下的政府职务由文官担任。1978年大选后权力移交给一个新政府，但军人保留历来的最高权力。国内政党提名的候选人中有三人为军官，其中一人已退休。1978年的总统大选虽然公开进行并且竞争得很激烈，但各方纷纷指控大选受到舞弊的干扰。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法定的多数票，根据宪法由国会推选总统，

宣布卢卡斯将军所得选票最多(42%)，当选总统。但没有参加投票的人约占登记选民的65%。

反对党是有的，但由于受到暴力和暗杀的威胁，使他们无法发挥真正的反对力量。不少政治家和其他积极分子遭到暗杀。现任政府批准了四个新的政党。共有七个政党，包括三个反对党，以及几个地方委员会在1980年的城市选举中竞选。然而，在选举前的三个月，经合法登记的一个左派政党有六、七名领袖被暗杀，因此该党没有参加竞选。大家普遍认为，选举本身在程序上是正确和公开的。约有30%的登记选民在选举中投了票。理论上，危地马拉的所有识字成人(占人口少数)均须登记和投票，文盲者则可自由决定。

宪法第四十三条禁止性别歧视，但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偏见使妇女陷于次等的地位。妇女文盲率较高，但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利用高等教育机会，她们占大学就读人数的25%。妇女结婚时有选择签订合同，保证婚约一旦解除，可以保留结婚时带来的任何财产。男子仍然占据大多数的政治和政府职位。”<sup>21</sup>

(b)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1978年7月，卢卡斯总统取得政权后说，他将容许所有政党登记，使政坛上出现多党制，俨然要为1982年真正的民主总统大选开

---

<sup>21</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81年2月2日，第447页。

辟道路。

事实上，卢卡斯政府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尽管有些政党已经登记，但是这些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政党领袖却屡遭暗杀。”<sup>22</sup>

- (c) 1980年9月15日，议会间理事会对 Alberto Fuentes Mohr 议员案件通过的决议：

“回顾会议间理事会特别委员会收到的来信透露： Alberto Fuentes Mohr 议员于 1979 年 1 月 25 日下午 1 时左右。离开危地马拉城的国民议会大楼时在街上被杀害；他在遇害前几天，曾受到生命的威胁，警告他不要执意在危地马拉选民登记处登记他为创办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名叫 Alvarado 的退役警察是谋杀证人之一，在事发当天下午在家中被架走，后来被杀害；危地马拉国民议会、政府当局和最高法院根据理事会的要求于 1980 年 3 月送交的资料显示，1979 年 1 月 25 日开始的一项调查程序（编号 109/79）目前由第九刑事初审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因目前尚在初步调查阶段，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司法科不能公布调查报告；公共检察官办公室代表国家，为本案的原告，

考虑到档案内的其他资料显示，杀害 Fuentes Mohr 议员是以暴力手段压制言论自由，出于肆无忌惮地以谋害手段消灭政治异己的惯用手法，

注意到危地马拉议会、政府和司法当局对理事会依照其 1980 年 4 月第 126 次会议的决议多次发出的信件，一直不采取任何行动，

又注意到委内瑞拉议会就 Fuentes Mohr 议员的谋害事件派往危地马拉进行调查的两位知名人士——当时的国会副议长兼众议院议长 C. Canache Mata 先生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E. La Riva Araujo 先生——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签证而无法访问危地马拉；议会间理事会业已及时通知危地马拉当局，表示对该调查团的任务极为

---

<sup>22</sup>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危地马拉对人权的侵犯行为”，1980 年 10 月第 10 页

重视，

1. 不满危地马拉国家集团及危地马拉政府和司法当局对议会间理事会为了解 Fuentes Mohr 议员的谋害事件调查经过及结果所作的一再请求、 及对委内瑞拉议会调查团成员取得签证的请求，一直不采取任何行动；

2. 根据档案所载事实。 危地马拉当局对理事会一再争取资料所采取的缄默态度、以及对委内瑞拉议会指派的调查团采取的不合作态度，断定危地马拉政府对 Alberto Fuentes Mohr 议员的谋害事件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第 23 条第(4)款：为保护其个人权益，人人有成立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共和国公民有权就各种生活目标自由结社，以促进、行使及维护其权利和利益，特别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

“国内的劳工制度应依照社会正义的原则予以建立。

“劳资关系法应设法协调双方利益，应包括一切有关的经济及社会因素，并应成为工人的保障。

“劳工法律以下列的社会正义原则为基础：

“工人和雇主双方有权为保护其经济利益、促进其社会地位自由结社。 但这些组织及其理事不应参加党派政治。

“在所有其他和解办法失效后，作为最后的一项手段，可依照法律行使罢工和关厂的权利，但只有出于经济或社会的原因才可以行使这些权利。法律应确定哪些情况可以容许罢工或关厂”。

《危地马拉宪法》第六十四、一一一、一一三和一一四条。

(a) 美国政府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劳工和工会自由在危地马拉的暴力情况下受到严重限制。 只有私营部门容许罢工，公共部门则不容许。 左派和右派的恐怖手段、特别是右派的恐怖手段（据称在某些情况下与资方或官方的保安部队有联系）妨碍了强大、独立的工会的发展，因此，独立的工会几乎绝无仅有。工会活动亦因非熟练劳工过多及缺乏有效的领导而受到阻碍。



缺乏有效的领导原因之一是1980年有八十多名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暗杀或绑架，这样造成的恐怖气氛不但阻碍劳工运动的自由蓬勃发展，还削弱和压制已经存在的工会力量。新工会的登记手续复杂、困难。政府依照劳工组织的标准提出了新的劳工法，其中的某些规定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工会力量，但劳资双方的反对使这项法律的通过受阻。工会认为劳工司法制度被袒护资方，是劳工不满的原因之一。政府对1980年初农业工人的非法罢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次罢工迫使政府增加大农场、农业、工业及商业方面的工资”。<sup>23</sup>

(b)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提出的材料摘录如下：

“现行的劳工法是在1947年制订的，但后来已经过四次修订。劳工法的中心思想之一是这样的原则：劳工法是维护工人的法律，因为劳工法设法补偿这些工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对他们给以优待的司法保障。此外，在劳工法的序言中，危地马拉国会表示，劳工法必须以劳资双方的基本和解为原则。一般而言，劳工法包含了这些用意。举个例子，第六十一条(c)款规定雇主对工人必须给以适当的体谅，在言词上或行动上不得加以虐待。

“有了劳工法为依据，工人们有权谈判加强劳工组织，最低工资、市区工人的社会保险、工作时间和假期等。

“但是，劳工法的规定后来受到其他规章法令的侵害，例如禁止工会进行政治活动，扩大雇主解雇工人所用的根据，减少工人的罢工权利和歧视农村工会等。

“此外，法律的执行是不公平的，因为劳工法庭采取拖延手段，使工会更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取得法律地位，而雇主则可以解雇工人而不受到惩罚。

---

<sup>23</sup> 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第446页，1981年2月2日。

劳工法规定，要使罢工合法，首先必须进行和解的听讯，而且所有雇员必须有充分二人数投票赞成罢工。表决不是非公开的，而是在劳工部长指派的一名法官主持下进行的。国际法院报告宣称，危地马拉的一个工会联合会表示，在劳工法规定下，只进行过一次的合法罢工，这次罢工是在 INCATECU 鞋厂发生的。罢工维持了 49 天，法庭作出有利于工人的裁决，下令资方必须依照劳工法支付他们的薪金。资方照着这样做，但后来工会会员却被解雇，资方拒绝让他们复职。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危地马拉的人权”，第 51 页）

“国际法院报告又称，‘法庭没有执行劳工法的条文，更谈不上实现其声称协助工人阶级这个目标，因此情况在日益激化’。（同上，第 52 页）

“在 1977 年 6 月遭暗杀的 Mario Lopez Iarrave 是危地马拉最具声望的劳工法权威，他写了很多文章和书籍说明现实情况。他说，举个例子，法庭拒绝举行公共听讯，这是对工人不利的，使公众无法认识到法律的缺点。他指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不合宪法的法律提出质询的程序，这种程序是工人所难以实行的，因为条文规定，诉讼必须‘由十个执业律师帮助’提出，大多数人连一个律师也请不起，更不用说十个了。

(Larrave, Procedencia de la vista Publica en el Proceso Laboral Guatemalteco, 8 Revista del Colegio de Abogados de Guatemala 1 (1978))

“Larrave 又说，把劳工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一般没有多大价值，因为手续极为复杂。

(Larrave, La Inconstitucionalidad de las Leyes en Materia Laboral y Como Motivo de Casacion, 8 Revista del Colegio de Abogados 11 (1978))

所有要纠正这种情况的努力均告失败。国会曾在 1976 年要求最高法院调查对劳工法庭的指控，但最高法院警告国会不要对司法部门进行干预。

“1979年8月国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劳工法草案；但至今尚未通过。

“政府声称，新的劳工法比现行的劳工法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政府并未有就此适当地征求自由工会的意见。实际上，工会认为，如果劳工法获得通过，连他们现有的权利也会剥夺掉，因此，他们完全不接受这项劳工法。

“举个例子，劳工法草案会：

- (一) 使工会更难得到承认；
- (二) 继续禁止按部门组织工会，以致永远无法建立整个工业范围内的工会；
- (三) 仍然禁止工会参加政治；
- (四) 进一步限制罢工权利；
- (五) 不扩大农业工人的有限权利。

(危地马拉没有签署《劳工组织第141号公约》(关于农村工人的组织及其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作用))

“代表全国律师公会和西班牙裔律师协会的美国律师团对危地马拉进行了两星期访问，于1979年3月28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表示，他们进行的调查使他们深信‘危地马拉司法制度的不公平’，因为他们所到之处‘听到人不断诉说危地马拉法律极不公平，特别是劳工法，它是专门用来维护资方利益、防止工人组织工会的工具’。”

(大赦国际，“律师遭袭击、绑架和杀害”，第19页，1979年)

“最后应当指出，虽然危地马拉批准了《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和《劳工组织第98号公约》，但并没有依照这些公约的规定对公民给以结社自由的保障他们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sup>24</sup>

---

<sup>24</sup> 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危地马拉对人权的侵犯行为”，1980年10月第11至14页。

(c) 1981年9月17日国际劳工局提出的资料摘录如下:

“针对您关于危地马拉人权问题的来信(编号: G/SO 214(34)), 谨向您提供下列资料。

“关于工会自由的问题, 国际劳工局行政理事会工会自由问题委员会曾受理过许多关于危地马拉的案件:

“第954号案件: 限制工会的法律: 1980年3月11日, 国际劳工大会提出了控诉, 转交危地马拉政府请它表示意见。委员会1980年5月、11月、1981年2月、5月的会议决定, 在危地马拉政府表示意见之前, 暂不审议本案。

“第957号案件: 委员会在其经行政理事会第216届会议(1981年5—6月)核准的第208号报告第274—289段中审议了本案。委员会的临时结论载于第289段。报告的英法文本随此附上。

“957号案件: 工会领袖遇害、被捕, 工会被搜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际饮食业及有关行业工人联盟、拉丁美洲工人工会团结常设大会、世界劳工联合会分别于1980年6月25日和7月7日提出控诉。1980年6月24日、8月8日和26日、9月2日, 拉丁美洲工人工会团结常设大会以及国际饮食业及有关行业工人联盟又提出了补充资料。有关的控诉以及补充资料都已转交危地马拉政府, 请它表示意见。委员会1980年11月、1981年5月的会议决定, 在危地马拉政府表示意见之前, 暂不审议本案。

“第978号案件: 数名工会领袖遇害1980年6月30日, 国际雇员和技工联合会提出控诉, 转交危地马拉政府, 请它表示意见。1980年7月11日,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来电表示该会附和国际雇员和技工联合会的控诉。委员会1980年11月和1981年5月的会议决定在危地马拉政府发表意见之前, 暂不审议本案。

“第1026号案件：一位工会领袖遇害” 1981年2月3日，拉丁美洲工人工会团结常设大会提出控诉，转交危地马拉政府，请它表示意见。委员会1981年2月和5月的会议决定暂不审议本案。

“委员会1981年5月的会议指出，尽管委员会一再要求，危地马拉政府仍未作出任何答复。因此，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由委员会主席在六月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同危地马拉代表就这些控诉交换意见。委员会主席已与该国代表接触过，不过该国政府仍未作答复。委员会下届会议（1981年11月）将审议这些案件的实质问题。

“公约和建议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对危地马拉执行下列公约的情况作了评论：关于工会自由和保护工会权利的1948年第87号公约、关于保护工资的1949年第95号公约、关于废除强迫劳役的1957年第105号公约、关于种植园的1958年第110号公约。评论的英法文本随此附上。

“公约和建议执行问题委员在第六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1981年）上审议了危地马拉执行关于工会自由和保护工会权利的1948年第87号公约的情况，决定在其报告中将危地马拉列为批准该公约后一直不付诸执行的国家，多年来，虽经一再鼓励，危地马拉在行动和法律上仍存在着严重的不遵守公约的情况，而且危地马拉政府拒绝与监督机合作（上述报告有关部分的英法文摘录随此附上）。 ”

#### 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对危地马拉问题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建议理事会核准本临时报告，特别是下列各项结论：

“委员会深表遗憾，虽经一再提出要求，危地马拉政府未能详尽答复控诉，委员会审议本案时无法参考该国政府的详细意见。

“委员会对工会领袖的遇害和被谋杀深表痛惜，对控诉所述的严重情况表示关切。

“委员会请危地马拉政府注意：自由独立工会的活动只有在一个保证基本人权的政权下才能获得发展。由于出现了命案、由于控诉所述情况十分严重，特请危地马拉政府制定政策，采取特别措施，充分保证人身安全的权利，保护工会成员不受非法逮捕和监禁，保证集会权和游行权，保护工会的房产和财产。

“委员会请危地马拉政府对控诉表示意见，特别是对关于工会成员遇害的控诉、以及关于工人和工会领袖目前被捕的控诉，表示意见。

“如导言中所述，委员会已授权其主席在下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同危地马拉政府代表联系，商讨本案悬而未决的问题。”<sup>25</sup>

---

<sup>25</sup> 劳工局，第216/10/20号文件，第216次会议，1981年5月22—29日，第48页，第289段。

(d) 以下是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提交的控词的摘录如下：

“在卢卡斯。加西亚担任总统期间，在危地马拉遭到最严酷镇压的是工会及工会会员。

“1976年大地震以后，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收入日益减少工会组织在危地马拉重新恢复。可是工会组织的恢复遭到了拉美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关于危地马拉情况的报告书中所指的法律措施——经修改后的全国劳工法——的控制。这种劳工法不准建立工会组织，禁止罢工，对工会领导人和工会会员进行直接袭击、暗杀、绑架和不断的威胁。工人在工厂里受到骚扰，工会领导人受到恫吓，工人参加工会集会就可能遭遇毒手，在工厂、家中或公共集会上随时都有被绑失踪的危险。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极少受到法律保护。按照卢卡斯。加西亚在1979年12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说法，政府认为组织工会是颠覆性的活动。1980年自始至终不断出现破坏工会权利、袭击工会会员的事件，可举出若干最严重的例子来说明工人的目前状况：

(a) 镇压五一节活动：

1980年4月29日傍晚，20至25名武装人员袭击位于危地马拉市中心的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办事处，当时工会正在开会。袭击者绑架18个人，殴打他们，警告他们停止工会活动，不准向报界发表谈话，否则即有生命危险后来他们被带到大街上释放。在五一节示威游行那天，数目不详的人士被绑架，拉美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说，失踪和被害者至少有100人。后来危地马拉报纸则报道危地马拉城中有19人被杀害。死者中间有受雇于Ray-O-Vac工厂——一家加拿大国际镍公司的子公司——若干工人和工人家属。报纸报道说，在五一节或五一节后数天全国有31人被杀。大多数被害者身上都带有酷刑遭伤痕。

1980年6月21日，26名工会会员在危地马拉城全国工

人联合会总办事处被绑。这些工会会员——大多数是工会领导人或执行委员——正在开会，讨论如何对前几日工会会友受酷刑被杀害的事件采取行动。大约下午三时，工会办事处附近的街道被封锁，估计60名武装人员闯入办事处，把整个办公大楼洗劫一空、劫持了26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附近的目击者说，听到枪声，发现办公室地板上沾满鲜血。危地马拉工会会员去官方拘留所询问，都打听不出失踪人士的下落。尽管全国工会联合会离警察总部仅有一条街，离国家警军第四师总部只有两条街，但内政部长和司法警察局长都否认危地马拉保安部队参与绑架，声称他们不知道失踪者的下落。全国工会团结委员会根据从6月1日袭击全国工人联合会事件中幸存的工会会员的作证，认为在麻醉药品，侦察科科长指挥的政府保安部队对绑架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0年6月，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成员对危地马拉作了一次现场调查，获悉工会会员在秘密拘留所中遭到拷打但仍活着。1981年初以下26人的下落仍然不明，大部分观察家遗憾地认为他们已遭到了杀害。

1. Orlando Garcia - TURSA ( 运输业 )
2. Bernardo Marroquin Salazar - KERINS ( 果汁和食品加工业 )
3. Mario Campos Valladares
4. Manuel Sanchez - INDUPLAST
5. Irma Perez - INDUPLAST
6. Florencial Xocop - ACRICASA ( 纺织 )
7. Sara Cabrera Flores - ACRICASA: Sara 已怀孕六个月
8. Hilda Carlota Perez - ACRICASA
9. Cristina Yolanda Carrera - Sistemas Electronicos
10. Rafael Antonio Aguilar - Sistemas Electronicos
11. Ismael Vasquez - EGSA Coca Cola Plant
12. Florentino Gomez - EGSA Coca Cola Plant
13. Irvin Rene Hernandez - CERMACO
14. Selvyn Arnoldo Garcia - CERMACO
15. Sonia Aledio - VICKS
16. Mario Martinez - FOREMOST
17. Cresencio Cornel Ordonez - Enlozados Nacionales



18. Jorge Luis Serrano - Enlozados Nacionales
19. Manuel Rene Polanco Salguero - Prensa Libre
20. Alvaro Estrada - CERRIACO
21. Luis Rodolfo Bonilla - FOREMOST
22. Oscar Salazar
23. Bernabe de la Cruz - ADAMS
24. Jorge Zamora - APOLO Industrial (肥皂工厂)
25. Sonia Furio
26. Manuel Antonio Rodriguez - KERNS." <sup>26</sup>

---

<sup>26</sup> 拉丁美洲人权问题教会间委员会1981年1月22日,第56和57页。

附 件

危地马拉政府提交的资料

秘书长根据第 33(XXXVII)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以及 E/CN.4/1501 号文件第 4 段，将 1981 年 6 月 17 日的文函转交给了危地马拉政府，该文函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人权委员会 1981 年 3 月 11 日通过的第 33(XXXVII)号决议。现将该决议的副本随函附上。

兹请注意委员会决议的第 1 段，其中“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同危地马拉政府就该国的人权情况建立直接接触，并从其他所有来源方面搜集有关的资料”。贵国政府定会注意到，该决议还请秘书长向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有关他同危地马拉政府接触的临时报告，并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供一份有关他接触情况的报告。

谨请贵国政府能响应人权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任何资料。

此致敬意。

..... ”

危地马拉常设代表处 1982 年 1 月 15 日向人权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下述文函并根据秘书长文函中所载的要求，随函附了有关材料，作为 E/CN.4/1501 号文件的附件。

危地马拉驻联合国瑞士日内瓦  
欧洲办事处常设代表处

1982 年 1 月 15 日，日内瓦

第 024/DH/82 号

先生，

我谨附上下述文件，以供参考：

(I) 危地马拉共和国政府 1981 年 3 月 5 日发表的官方公报；

- (2) 危地马拉驻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常设代表处 1981 年 8 月 31 日致人权司司长特恩·范博文先生的第 781/81 号文函的副本及附件，<sup>27</sup>其中载有危地马拉政府就极端主义国际组织的干涉以及外国人参与侵害危地马拉的行为的问题发表的公报全文；
- (3) 危地马拉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1981 年 9 月 11 日致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第 ES/2.5.4/776 号文函的副本；
- (4) 耶稣会牧师路易斯·爱德华·佩列塞尔·法伊纳 1981 年 9 月 30 日发表的关于他参加穷人游击队的公开声明；
- (5) 危地马拉共和国国会 1981 年 12 月 15 日发表的声明。

请您将本文函及其附件作为人权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同时以“危地马拉政府提供的资料”为标题作为与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2 有关的第 E/CN.4/1501 号文件的附件，予以散发。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常驻代表

安娜·玛丽亚·卢卡斯德里维拉大使  
( 签字 )

日内瓦，万国宫  
人权委员会主席，

#### 官方公报

危地马拉共和国政府为履行其使危地马拉公众和世界自由人民了解情况的义务，兹报告：

一、在埃尔基切地区最近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危地马拉军队包围了一个叛乱营地。 一个化名为“马诺洛指挥官”的颠覆犯罪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从他身上缴获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包括颠覆分子领导人先是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后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会议期间拟就的计划和指示；在这些会议上，着重讨论了由上述国家

---

<sup>27</sup> 附件中所载资料供秘书处内协商用。

的政府无条件地为那些背弃危地马拉事业的杀人犯和恐怖主义者提供物质援助的问题。

二、从缴获的穷人游击队的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秘密的组织“正试图”对其他的颠覆性组织行使权力和影响，并打算通过去年九月底宣布的穷人游击队、人民武装组织、危地马拉劳动党和起义军的颠覆性的“四方联合”，今后去这样做。这一颠覆性集团联盟的目的是要在马列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提供的国际支援的情况下，把共产主义专政强加给危地马拉人民。

三、马诺洛指挥官从古巴回来时，带回了把各个颠覆性组织联合起来的命令，并直接向穷人游击队的全国领导人负责。

四、去年九月中旬，这四个颠覆性组织因为彼此间突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举行了三次会议，但是，尽管它们联合了，它们也无法满意地解决这些分歧。冲突之一是关于反压迫民主阵线的加入和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将要进行的反危地马拉的活动的问题。

五、很显然，那些经古巴哈瓦那指定的苏联帝国主义的走狗参加了一系列的“最高”会议，其中有：(1) 穷人游击队的里卡多·拉米雷斯德莱昂，即罗兰多指挥官；(2) 人民武装组织的罗德里戈·阿斯图里亚斯·阿马多，即加斯帕尔·伊隆指挥官；(3) 起义军的豪尔赫·伊斯梅尔·索托·加西亚，即巴勃罗·蒙桑托或称曼萨纳；以及 (4) 危地马拉劳动党的何塞·阿尔维托·卡多萨·阿杰拉尔，即马科斯指挥官，而这些人今天已作为本国的叛国者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帮凶遭到谴责。

六、于是，他们决定着手同古巴的领导人，特别是同菲德尔·长斯特罗本人订立协议，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在危地马拉完成计划。因此为了得到物质、政治和军事上的声援，已就这四位颠覆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两位化名为马诺洛和胡安的属于穷人游击队和起义军的恐怖主义分子行将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讨论和通过的那些计划作出了安排，他们的任务包括确认协议，建立各种小组以及继续进行联合等事宜。

七、因此，他们在尼加拉瓜的共产主义治安部队的保护和资助下举行了会议，会上通过的计划包括：毁灭危地马拉、杀害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使危地马拉彻底贫困化，以及在颠覆危地马拉的力量的公开支持下和在那些憎恨生育自己的这

块土地的叛国者的帮助下，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桑地诺阵线的政权所设计的侵略、挑衅和恐怖主义的行动。

八、颠覆分子开始是想在古巴的哈瓦那，当着该岛的共产党独裁者的面，签署投降书的最后文件的，但因各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只好改在马那瓜干这件事。因此，秩序和自由的敌人极力吹捧的“中美洲主义”不过是外国政府用来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的一个幌子。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贝亚尔多·阿尔塞以及其他人士，作为尼加拉瓜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该文件的签字仪式。

九、有关签署将这四个组织联合起来的文件的细节揭示，这四个派别的领导人之所以特别要签署这一文件，是因为他们决定应该给古巴的苏联共产党的傀儡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本人一份单独的副本。签署该文件的人把该文件视为历史性的文件，可不是吗？！因为还未有过任何一个其他政治组织犯下如此严重的损害危地马拉的背国罪行。他们想，一旦危地马拉落入苏联帝国主义的魔掌，古巴独裁者就会带着这份单独的副本亲驾危地马拉。共产当局的这份反对我国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誓约或条约得到了其他的共产党头面人物的支持，如贝纳德里尔以及古巴军官曼努埃尔·皮涅罗的支持，这两人作为代表团的领导成员同美洲司的其他官僚，如阿夫芬·卡诺，以及萨尔瓦多最高革命指挥部的领导人阿夫雷因·卡多纳和曼努埃尔·莫拉、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共产党书记等一起特地去马那瓜出席签字仪式。

十、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代表在尼加拉瓜考察了一个桑地诺民兵营的战斗力和演习之后，乘机同古巴顾问和桑地诺的共党分子巴亚尔多·阿尔塞和温贝托·奥尔特加·萨维德拉等人交换了计划，而这些人主要地负责推进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共产革命和加勒比地区的革命过程以及转送社会主义阵营（越南、朝鲜和大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就军事援助而言，正在提供的有：苏式7.62毫米冲锋枪（保加利亚和北朝鲜）、早先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的法国武器，FAL，G-3，M-16和Galil步枪以及掷弹筒（“中国式武器”）。

十一、尼加拉瓜已答应帮助那些颠覆杀人犯转运武器和军火，这些匪帮得到的武器和军火先是通过古巴运到尼加拉瓜，然后再从尼加拉瓜通过陆路、空中和海上运到危地马拉。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从桑地诺的军火库中预拨了1,800支MAS

法国造的卡宾枪和 10 万发这些武器用的子弹。 简言之，桑地诺分子华金·夸德拉，国防部副部长兼桑地诺阵线总参谋长共党分子胡里奥·拉莫斯，情报局长（谍报）以及巴亚尔多·阿尔塞司令的副官一直是负责协调各种后勤活动的班子的成员。

十二。出现在马那瓜的还有其他一些侨居在国外的叛国者，其中有：路易斯·科多扎伊·阿拉贡，杀人犯和恐怖主义叛国犯的“鼻祖”、吉列尔莫·托列略·加里多（此人负责国外的政治和外交活动）、阿莱德·福帕，索洛萨诺的遗孀，妇女马列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以及叛国犯卡洛斯·帕斯·特哈达；这些人都是危地马拉反压迫“民主”阵线的成员和创始人，该阵线是代表穷人游击队的一个组织，而穷人游击队正于极力诋毁危地马拉和它的民主政府，试图把危地马拉和它的民主政府同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开、歪曲危地马拉的人权政策以满足其私利以及欺骗诸如大赦国际这样的组织。 出现在马那瓜的还包括一些危地马拉的共党分子、如卡洛斯·加利亚多·弗洛雷斯、吉列尔莫·科洛姆、阿格塔、米格尔·安赫尔、阿尔武苏雷斯·佩德罗萨、伊斯雷尔·马克斯·皮瓦拉尔、建筑师希尔维托·卡斯塔涅达·桑多瓦尔（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建筑系前主任）以及阿方索·鲍尔·派斯；这些人还是总部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危地马拉“民主”解放阵线的成员。

十三、由这些颠覆组织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在古巴期间像苏联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拜见了俄国、北朝鲜和越南的外交代表团。 他们往访苏联驻古巴使馆的目的是要乞求其共产党主子们批准他们在尼加拉瓜拟订的计划并给予经济、思想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以推翻危地马拉共和国的合法政府。

十四、类似的情况还有，去年十二月，全国革命者联盟派出了一个以共产党分子马科斯（其真名为何塞·阿尔维托·卡多萨·阿吉拉尔）为首的代表团在古巴出席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该联盟是由危地马拉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凑合而成的。

十五、已缴获的有关文件可靠地表明，目前在古巴已有 243 个营地，为数很多的危地马拉人正在那儿受训，准备将来担任连、排和班一级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在参与不得人心的暴动的危地马拉青年中，多数人或是因为背信弃义或是非出于个人意愿而去送死的，事实上，他们的景况十分黯淡，朝不保夕，捉摸不定，因为参加共产党的革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死亡。

十六、此外，危地马拉的颠覆分子由于很少或根本得不到危地马拉青年人的合

作因而现在在古巴招募雇佣军，作为他们的国际顾问；这些雇佣军由于曾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帮助过苏联扩张主义因而已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们又是些典型的虐待狂者，因此，随时会到危地马拉来，为一项得不到我国人民欢迎的事业而作战。

十七、已缴获的那些文件还提供了有关建立和实行新的颠覆阵线的决定的资料，其目的很明显，要在那些尚未尝过颠覆苦头的无防御能力的人民中间继续制造恐怖、破坏、死亡和饥饿。因此，一切珍惜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危地马拉人必须将所在地区内何时何地出现的颠覆犯罪集团的情况告之当局，以及可能的话，包括他们的人数；颠覆分子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因而雇用了许多普通犯人。

十八、最后，需指出的是，共党分子用他们从一系列袭击、绑架和勒索等手段中得来的“大量”资金购买了大批尖端武器，而在受害者中间，有些则是在我们社会中受到尊敬的家族。

十九、共和国政府向危地马拉人民呼吁，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抵抗共党的颠覆，所有的人都要帮助维持安宁。

二十、国家有义务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到破坏，有义务防止危地马拉人成为那些试图散布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人的受害者。

二十一、鉴于马列主义者继在有关国家新近举行的两次会之后正计划在本地区制造恐怖威胁，危地马拉政府再次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危地马拉政府尊重和遵守不干涉他国内外事务的原则并要求他国对军地适用该原则，以便危地马拉能维护其自由、主权和独立。

二十二、最后，促请危地马拉人民保持一种明智和具有判断力的态度，切勿掉以轻心而为那些职业鼓动家们所用，这些人使用着外国提供的口号，极力阻止共和国合法总统罗米欧·卢卡斯的国民政府制订的各项规划的进展。

外 交 部

1981年3月5日，危地马拉

文号 781/81

日内瓦，万国宫

联合国人权司司长

特恩·范·博文先生

先生，

我谨就危地马拉代表处收到贵司的有关危地马拉的各种照会和来文以及就1981年6月在您办公室内同您的谈话写信给您。

我愿在此再次重申危地马拉代表处愿意同您和贵司的其他官员进行最大的协作和合作。

为此，随函附上文件一札，供您参考，内有危地马拉政府通过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处发表的新闻公报，该公报是与极端主义国际组织的行动和外国人参与扰乱危地马拉和平的暴力行为有关的。

另，附上该公共关系秘书处提供的几份有关参与这些行动的人的身份证的影印件和一套这些人的本人照片。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常驻代表

安娜·玛丽亚·卢卡斯德里维拉

大使（签字）

1981年8月31日，日内瓦

附件：如上述。

#### 新闻公报

业已再次查明，极端主义国际组织的露骨干涉和外国颠覆犯罪分子进行的扰乱危地马拉和平的暴力行为纯系三个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一些危地马拉籍的煽动者一起干的，这些人已在国家治安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国家治安部队在袭击中攻破了颠覆分子设在首都第14区的一个据点。

还查明，这三个外国人是以假名字进行活动的，其中的两个人是天主教牧师，至少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以这种身份出现的，但他们实际的任务是要在危地马拉社会中散布仇恨。



话又说回来，去年7月25日，国家治安部队在该区第3街“A”19-96号发现了极端主义分子的一个躲藏处。

当局用喇叭喊话，要藏匿的颠覆分子投降。

但是，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却用炮火回敬，于是发生了武装冲突，其结果，该躲藏处全毁，恐怖主义分子也被打死。

其中有个受致命伤的人揭露说，颠覆犯罪分子包括了三个外国“指挥官”，他们分别化名为：“米格尔”、“佩德罗”以及“安东尼奥”或“胡安·何塞”。

头两个人已查明为天主教牧师，第三人则为一个古巴的共产党士兵。其他的二男三女的叛乱者都是危地马拉籍人，但他们完全受外国恐怖主义者指挥，为国际颠覆活动服务。

国家治安部队根据在颠覆分子躲藏处缴获的文件以及根据移民局和国家警察局所存的资料，对那个垂危的叛乱分子提供的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核实。

### 调查的结论

所谓的“米格尔指挥官”就是拉乌尔·约瑟夫·莱杰，一个加拿大的牧师；在他身上搜到了一份以他的真名签发的摩托车驾驶证。他的地址在克萨尔特南戈行政区康塞普西翁·奇基里查帕。这是通过指纹检验处的档案得到证实的。

移民局提供的资料包括了天主教牧师拉乌尔·约瑟夫·莱杰的档案，其中载有下述文件：

1. 克萨尔特南戈的主教路易斯·曼莱萨·福尔摩萨1979年4月20日提出的要求给予加拿大籍的“传教士”拉乌尔·约瑟夫·莱杰（护照号码：AF-31827）签发危地马拉居留证的申请。根据申请，该牧师应在克萨尔特南戈主教管区内的康塞普西翁·奇基里查帕市的教区工作；

2. 使徒代管教区牧师奥斯卡·加西亚·乌里萨尔1979年7月6日提出的要求给予该加拿大牧师拉乌尔·约瑟夫·莱杰延长其在危地马拉的居留期限的申请；

3. 使徒代管教区牧师奥斯卡·加西亚·乌里萨尔1981年7月6日提出的要求再次给予该加拿大牧师拉乌尔·约瑟夫·莱杰延长其在危地马拉居留期限的申请。

所谓的“佩德罗指挥官”已查明为西班牙籍的安赫尔·马丁内斯罗德里戈，此人持有1977年11月9日经西班牙大使批准并由当时驻危地马拉的西班牙领事海梅·鲁伊斯·德尔阿沃尔签发的第E. B238323号护照。

还得悉，安赫尔·马丁内斯罗德里戈是以牧师身份在危地马拉进行活动的，这一点已为一名垂死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的证词所证实。

所谓的“安东尼奥指挥官”或“胡安·何塞指挥官”乃是一名古巴的共党民兵，名叫塞尔希奥·鲁伊斯，在他非法地进入危地马拉领土之后，危地马拉的治安部队一直在寻找他。

通过指纹查明的其他两名恐怖主义分子为：危地马拉人，奥拉西奥·门迪萨瓦尔·加西亚，据说，他是一个建筑师兼营造业者，以及化名为“阿尔瓦”的米雷娅·西富恩特斯·佩雷斯·德拉吉拉尔。

至此，在同治安部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的八名恐怖主义分子中，已有五名的身份已完全查明，通过这一查证证明了，外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旨在在危地马拉的乡村和城市发动一场颠覆性的运动。

这也证明了，天主教牧师们已拿着武器参与了政治的斗争，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和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幌子下，积极地参与了恐怖主义的活动，以此来破坏危地马拉的社会机构。

同时，也表明了，在危地马拉从事颠覆活动的马克思主义颠覆活动的领导人都是些外国人，因而说明了危地马拉的颠覆运动完全是人为的。

尽管危地马拉面临着以恐怖主义行动为形式的强大的国际侵略，但我们重申了我们的毫不动摇的决心，坚决去维护作为自由、进步和幸福的源泉的民主机构，坚决去同极端主义的狂热分子作斗争。

1981年8月3日，危地马拉

文号：ES/2.5.4/776

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981年9月11日，纽约

纽约联合国

秘书长

库·瓦尔德海姆

先生，

我荣幸地写信给您，就主管政治和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威廉·B·巴芬先生今年8月24日的来照作出答复。巴芬先生在其来照中十分友好地向我国政府建议，厄瓜多尔公民、人权委员会成员胡利奥·普兰多·巴拉霍先生作为联系人，以实现1981年3月11日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33(XXXVII)号决议的目的。人权委员会在该项决议中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就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同危地马拉政府建立直接接触，并从其他一切来源方面搜集有关的资料”。

经同外交部就上述建议进行协商之后，我谨通知你，尽管我国政府愿意进行合作，但认为，建议中所述的杰出的厄瓜多尔人、胡利奥·普兰多·巴拉霍先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危地马拉政府认为，上述决议中所指的接触应该由您本人通过您办公室内的一位适当的成员来建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处理所有类似情况时的一贯的做法那样，而不应通过一位人权委员会的成员来建立此类接触，更不用说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设立的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了，因为危地马拉还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我们认为，秘书长所建立的接触应始终保持不偏不倚和客观的原则，不应有任何政治偏见，而这一切正是您在您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中留下的十分美好的印象。相反的做法意味着接受一个特别报告员的制度，而对这种制度，我已代表我国政府在今年2月于日内瓦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反对。

我愿向品质高尚的胡利奥·普兰多·巴拉霍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我国政府认为，由于我所提及的职责和地位关系，他是个不可接受的人选，不可能恰当地履行人权委员会委托给您的这项任务，为此，请您重新考虑这一建议。

危地马拉政府认为，危地马拉正在遭到国际性的攻击，而这种攻击由于那些具

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秘密集团的暴力行为而在加剧，同时认为，国家当局根据宪法的授权正进行着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全力维护得到宪法和共和国立法保证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为此原因，危地马拉政府特别希望确定，任何有关危地马拉的人权的消息不应受到那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观念的曲解，例如受到某些众所周知的国际组织所推行的那些观念的曲解。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常驻代表

爱德华多·卡斯蒂略·

阿里奥拉大使（签字）

耶稣会神父路易斯·佩列塞尔·  
法埃纳在工会中心的公开声明

主管公共关系的总统秘书、卡洛斯·托莱多·别尔曼记者的开场白：

各位外交和领事团的贵宾、国务部长和副部长、总统秘书和副秘书长、高级文职人员、国际的和危地马拉的新闻界的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特别感谢诸位不辞麻烦，冒雨前来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诸位应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处的邀请参加的这一记者招待会是在本人，特别是在共和国总统罗米欧·卢卡斯将军的要求下举行的。

举行这一记者招待会的目的是要向诸位介绍一桩发生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十分重要的事情，即把一位危地马拉的耶稣会神父介绍给诸位，有人认为他已失踪或已遭劫持，可是，他根据自己的决定，竭力寻找国家治安部队，确信治安部队会给他提供个人的保护，同时也是为了就他作为穷人游击队的成员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某些重要的揭露，他在该游击队中曾一度担任过各种职务，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将由他自己告诉诸位。共和国政府希望十分清楚地说明的一点是，政府在把耶稣会神父路易斯·爱德华多·佩列塞尔·法埃纳介绍给诸位，并非想要同天主教会这一公共机构发生争吵或摩擦，相反，政府希望就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青年面临的潜伏危险来说，该耶稣会神父所说的话，所作的揭露，所示的忏悔，所作的改变以及所受的赦免能对所有的危地马拉人以及整个世界起到榜样或精神启发的作用。我曾同佩列塞尔神父谈及他目前享有的安宁以及他能向危地马拉和世界诉说他的改变和忏悔时感到的快乐，至于他之所以改变和忏悔的原因，诸位马上就会知道。

这就是说，为了上述自愿投奔治安部队的佩列塞尔神父得到了最好的最人道的待遇，我们愿正式宣布，他可以按照其个人的意愿或留在危地马拉继续从事神父的活动，或去他愿意去的国家。

其次，如果他愿意离开国家的话，我们愿请危地马拉新闻界、外国记者和任何一个危地马拉人在他离开的那一天自便陪同他去机场。

现在我高兴地把耶稣会神父路易斯·爱德华多·佩列塞尔·法埃纳介绍给诸位，因为我觉得，他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他的经历，他参与穷人游击队的情况，他的改变、忏悔以及最后的赦免定将是诸位今晚可能会得到的最深刻的感受。

请神父讲话……

佩列塞尔·法埃纳神父的发言：

各位晚上好，蒙各位赐听我的发言，予表谢忱。

卡洛斯·托莱多·别尔曼先生已经告诉各位了，我的名字叫路易斯·爱德华多·佩列塞尔·法埃纳，耶稣会神父，35岁，危地马拉人，一直到去年6月8日，我是穷人游击队的成员，就是在那一天我独自决定去寻找治安部队，以便结束我那颠覆分子的生涯，结束我那在穷人游击队中的军事生涯。

我串通了一位在治安部队中服役的老朋友，实现了我那自愿劫持的行动。有一次，我们俩都在国外，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以便我有需要时找他。我这样做了，接着，我们计划了自愿劫持的行动。

我知道，本国的新闻界，也许还有国际新闻界，都把我的失踪作为绑架来报导。就那些新闻故事来说，如果目击者属于不知内情的第三方，那自然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因为故事的最后描述必定是以各种解释或可能性为依据的。

我愿提一下我的专业背景，因为我相信，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我通过14年的学习能得到何种特权、机会和培养，那是很重要的，以便各位作出更加明确的判断以及更正确地看待我正向各位所作的忏悔……我正向各位请求宽恕，并给予应有的同情。

我1963年毕业于“危地马拉中学”，获理学和文学学士学位；1967年，参加耶稣会，并在那儿进行各种与教士职位有关的研究，获得了厄瓜多尔基托天主教大学的通讯科学和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此后，我又获得了墨西哥自由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我还在墨西哥的西班牙—美国大学读完了土木工程课程；我曾在耶稣会里做过管理工作并还研究过耶稣会的管理和耶稣会成员的职责，最后，我获得了萨尔瓦多神学中心的神学硕士学位，那是一个与何塞·西梅翁·卡尼亚斯大学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学派有关的课程。

我说这些并非是要自我吹嘘，只是想为下述一些问题提供一个背景：

象我这样一个在无忧无虑中成长的人，

一个能有那么多机会进行学习、选择职业，以及获得大学水平的学术和知识经验的人，

一个基督教徒、神父、笃信宗教的人，怎么可能失足到此等地步，选择暴力的生活并加入秘密的革命组织“穷人游击队”？

各位也许会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或更多的一些问题。

我将尽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十分至诚地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我掌握了，或者说，学会掌握了一般人所见不到的三种具有不同能力的基本武器。这些武器不是那些装有火药的武器，而是一些比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弹药攻力更大，爆炸性更强，影响更广的武器。

其一就是解放神学中所述的各种主张。

我想，在座各位，包括外国记者，了解一些有关教会的最近历史，因此我冒昧地请各位听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968年，拉丁美洲教会在哥伦比亚的梅德林举行会议，本大陆的所有主教都参加了，那是与会者最多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修改二年前由第二届梵蒂冈宗教会议制订的新教会的指导原则。

在梅德林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派会议试图通过宗教来解决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该次会议产生的主教派指导原则逐渐传给了拉丁美洲国家中的许多僧侣统治集团以及各个宗教教会，包括我参加的那个耶稣会。

那末，这种解放神学，即产生于梅德林会议、后在去年举行的普埃夫拉会议上得到加强、并将一意孤行地成为各个宗教会的一部分的这种新的宗教办法，又谓何物

首先，它向所有的穷人塑造了一个新的耶稣的形象，这个耶稣同我们从福音书和从我们准备首先用于交流的教义回答手册中的教导方面了解到的那个耶稣完全不一样：成了一个反叛的耶稣，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耶稣，一个已变成没有任何人类特性的“基督”似的耶稣，一个已经成为或将永远成为带有偏见的上希似的耶

稣，而这个上帝又是穷人的上帝，只保证拯救穷人，贫苦的人和赤贫的人，决不拯救富人，强权者，政府首脑。

很自然，这是曲解的首要根源，一个错误布讲的信条；从新福音书的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向：耶稣是穷人的上帝，仅仅是少数人的上帝。

很自突，那些接受这种讯息的人不免要问：其他人怎么办呢？当然，说的是富人怎么办呢？

教会的答复，确切地说，我们这一辈的教会的答复是：富人具有四、五百年的教会历史，在此期间，他们同教会狼狈为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心狠手毒；现在该是教会同强权，同富人彻底分开的时候了，该是教会宣称，上帝，穷人的上帝，仅仅是少数人的上帝，因而永远地只为穷人服务的时候了。

去年，我们在这方面甚至还教导人们说：“圣诞节只应由穷人来庆祝，因为这是他们的上帝，穷人独有的上帝的诞辰；我们不知道，富人在12月24日庆祝什么，”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方面：解放神学塑造了一个不同的耶稣，一个革命的耶稣。

第二方面是：这个耶稣有着特别的计划，他带来了特别的使命。据说，圣父要他下凡建立一个神政，一个被我们，特别是我辈耶稣会会士认为与社会主义相同的神政，一个责成我们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神政——很显然，要建立这样的社会，我们就需要有权力。

至于我们如何能取得权力的问题，这将是我要在下面讲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责成我们在这尘世间建立此种社会主义神治的耶稣还是一个同传统教会不相容的耶稣，他拒绝接受教会的一切体制和僧侣统治的结构，反对传统的道德，漠视那些鼓干我们社会并使几代人寄于希望的习俗和惯例。

的确，在此种主张的基础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道德：“革命、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唯一重要的，唯一完美的东西，其他的一切统统可以放后”。

这种新的道德不太注意诸为结婚不经过合法的法律手续、以及离婚和各种无法无天行为的情况，关心的只是社会主义和夺取权力这样的头等大事。



这就是第一种武器。第二种武器便是所有的耶稣会会士，即差不多所有的我这一辈的耶稣会会士在大学四、五年的学习期间所学到的那种马列主义思想方法。

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曾去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学了四年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设想，作为一个神父，如要能适应现今世界的需要，就要熟悉、精通马列主义这门科学。我们还设想，我们所寻找的只不过是一套工具，一种技术，用来分析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会受到剥削以及他们怎么会受压迫的；但是，尽关有这些表面现象，这还是一个我无法深刻理解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这种分析性方法可能会明显地停留在理论和刻苦表达的范围内，停留在研究和书本上。但是这一方法犹如医生所用的解 刀，如果解 不用在手术室内，不拿来为病人治病开刀，那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我当就不会认为，一切会停留在理论上，理论必需要付之实践。

第三种十分强大的武器便是我们二年前在大会上作出的耶稣会的或者说耶稣会会士的选择，那次大会充分地代表了耶稣会。

那次大会决定耶稣会会士应首先代表城乡的穷人工作，并决定我们应帮助加快传播在过去的几年间已开始传播的信息。

因此，我们的精力、资源、知识、金钱以及最大的才能都用来强化我们已经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开始的布讲。

现在让我们从这三种基本武器得出一些结论。

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我们全体人民的此种最神圣最深厚的感情，我们播下了第一颗歪曲形象的种子：提出了一个新福音书，塑造了一个陌生的耶稣，即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耶稣。

通过一个我们承认只属于穷人的教会，一个同僧侣统治不相容的教会，一个完全背离一切传统道德原则的教会，我们决心成为有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的真正战士。

毫无疑问，还可得出许多结论，其中之一就是：

我们耶稣会会士知道如何“影响人民”，为文化和政治水平都很低的人民配制适当的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剂，我们能为受压迫的人们提出整套的教育思想，我们凭借着作为一个牧师，一个使者，一个教会成员能有的权威，使用直观教育方法，传播了有系统的教义回答手册中的知识。

这就使我们能在我们那些纯朴的人民中间大显身手。

我作为一个牧师先后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取得了实际使用这三种武器的经验。

各位会意识到，这方面的全部经验乃是我前面提及的专业背景的一部分。

要我在萨尔瓦多干些什么工作？在萨尔瓦多，我们同一个称作“圣经代表”的宗教组织一起工作。该组织的工作与乡村中的老的“教义回答式教学者”所做的工作雷同，和乡村牧师合作进行，但它又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结构范围：它使农民有可能依附于社会，感觉到自己是某个整体，某个集团的一员，有着必须履行的专门任务。

比如，其中的某些人属于信息的“制订者”，以便日后能有信息传播给旁人；其他一些人属于所谓的“侦察情况者”，即是负责搜索新的区域，了解人民的习俗，研究如何深入人民的人；还有一些人则是所谓的“加强者”，或者说，负责访问社区，促进社区的需要，保证“圣经代表”这一组织继续存在的人。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立足点：我们成功地把乡村的群众集合在一起，通过该信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此外，我们促使他们了解并乐意接受如何能使自己组织起来的这方面经验。但是，各位一定会意识到，没有一个人仅仅为了组织而参加组织的。

每项组织行动都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进行的。而这就是我们在萨尔瓦多想要干的事情，以便为我们在宗教基础上所提倡的组织纲领确定第二个标准。这第二个标准是什么？确切地说，那就是提出一项政治号召：你们必须自己保卫自己，免受你们各行各业中的老板们对你们的剥削，你们必须对抗剥削。你们用什么对抗剥削？用我们已经教给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怎样有效地对抗剥削呢？团结起来，抢在老板们的报复之前采取措施。你们还必须知道什么？那就是如何保卫自己。那末，如何保卫自己？那就是，采取一系列我们称作的自卫措施，也就是，只有开展真正的暴力行动。

就这样，我们顺利地把为数众多的农民集合到一块，并向这些群众灌输了深刻的社会宗教和政治道理——这就使“法拉本多·马席人民解放武装”在转瞬之间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我从未想要让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我是准备这块“现成的”肥沃土壤的人之一，因而让人民解放武装把所有的受到圣经和教会权威所吸引的无辜农民当成了进食的对象。

各位都很清楚发生在萨尔瓦多的后果。我不能说我要对我们姐妹国家经历的惨况承担全部罪责，但我确实应该当着各位的面以及向每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承认，我是造成死亡、痛苦以及其他许多后果的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因为我促进了此种使该国人民蒙受痛苦、贫困和更多暴力的局势的发生，而那里的人民却为我提供了六年多的住所。

1976年12月5日，我在我居住的阿吉拉尔村被委任为牧师之后，就被调到尼加拉瓜去干完全一样的工作，但因当时索摩查政府还在执政，我们只得加倍小心。

尼加拉瓜的农村形势并非那样的一触即发，这是因为那里的土地比较多，也因为我到达尼加拉瓜的那个时候，农民们还未具有战斗性。然而，正象我们在萨尔瓦多干的那样，我们促进了圣经代表的联合工作，与此同时，我们鼓励合作事业，希望借此能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有基础的，得到一些实际支持的。

我想确实证明的是，我们所倡议的联合耕种土地的办法有着三方面的主要目的：一是要为维持合作社和再投资提供资金；二是要使该地区的所有的人摆脱饥饿的状况；三是要把资金转送给桑地诺阵线的各派，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当时桑地诺阵线正在该国的北部山区，塞戈维亚斯一带进行战斗。

简言之，这就是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经历。我可以说，我在危地马拉干了类似的事。

1977年上半年，我从尼加拉瓜调到危地马拉，到达危地马拉之后，我被派到一个称作“研究和社会思想中心”的耶稣会牧师社区工作。该中心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进行过特别研究的耶稣会会士集会的地方——是一个耶稣会中的“高贵者”集会的地点。

为显示清寒耶稣会会士决定住进在第五区帕尔米塔市场附近租赁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因此，该社区其后就成了“第五区社区”。

该社区的耶稣会会士一直活动在在我国西部的农村地区，达六、七年。

他们去那儿执行圣经代表的职能并举办短期的扫盲、急救宗教和合作化的课程。换句话说，他们正准备新的十分肥沃的土壤，而这土壤已为“农民团结委员会”所使用。

我不相信耶稣会愿承担有关建立该组织责任。耶稣会也许一开始并未抱着这一目的，但耶稣会当然赞同，支持该组织并帮助它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首要的是，帮助“农民团结委员会”在国际上获得发言意见的机会。

如果能让全世界都知道，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举行了暴动而且还是我们革命政治组织的基础，这显然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另一方面的行动，在采取此类行动时，过去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的耶稣会会士都是同谋：他们在国外散布各位都了解的那种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恶果的舆论。

我因健康原因，也因在城里有事要干，所以从来在危地马拉的乡村地区工作过。当时大家认为，在工运活动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并认为，虽然我们再也无法象过去那样深入工会，但还是有很好的机会的：如果工人住在城外的定居点内的我们可以直接去他家里，在他的住处提供帮助。

这就是我被派做促进名为“移民协会”的这一政治组织的工作的原因：这个组织实际上在1977年年中就不存在了，其名字只是在电台广播广告时以及在散发的一些宣传性的传单中使用。

我在几个市郊的定居点内开始工作，一些也是移民的青年人和我一起工作，这样可以加快工作的进度，因为这项工作当时被认为是很紧迫的。

和我一起工作的只有十个青年人，那是很不够的。与此同时，贝尔加私立中学的修女们建议我去当她们称作“乌斯潘坦活动”项目的顾问。该项目的内容是，趁为学生的假期，把她们带到我从未去过的基契行政区的乌斯潘坦和一些村子里，

为她们举办一、二个月的特别课程，让她们同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这样她们可以直接的农民提供帮助，并能切身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苦。我接受了修女们的建议，成了“乌斯潘坦训练活动”这一项目的顾问和组织者，并在学习期间，我从该项目中抽调一些最好的学生帮助我作移民的工作。这就是一直到了1978年年中的情况：我使用我前面所述的三种武器，继续进行此类的工作，尽管我并没有同危地马拉的任何一个秘密游击队组织发生具体的联系。到了1978年的6月或7月，有个叫做劳拉·乌尔塔多的姑娘来找我，建议我参加穷人游击队。我曾在定居点工作时见到过她。她说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和我个人的能力，又说，如果我参加穷人游击队，就能最好地发挥我的潜力。当时，我对她说，我因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绝对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其一，我当时正在考虑四、五个月之后同一个还未来危地马拉的尼加拉瓜姑娘结婚，我不愿未经和她商量，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其二，我认为，婚后的生活同一个游击队员的破坏性的狂暴的生活要求是很不相称的。但是，她非常明白地对我说，他们可能还会来请我参加。一年之后，由于我在移民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在宣传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我认为我在政治上已经很成熟，此外，我原先打算结婚的计划已成泡影。我亲自去见了原籍西班牙但已加入危地马拉国籍的曾经当过耶稣会牧师的恩里克·科拉尔·阿隆索和劳拉·乌尔塔多的丈夫，我对恩里克说，我愿意参加穷人游击队。

二个月之后，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有个假称是马诺洛的人同我见了面，并对我说，我的要求已被接受，穷人游击队得悉我要成为其成员感到很高兴，尽管我还不是一个真正军人。我想我有必要向各位说明一下：所谓真正军人就是全部时间都为该组织工作的人，由该组织提供住处，经济上依赖穷人游击队；但他在地下活动，遵守一个真正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我始终起着一个帮手的作用——换句话说，我并不遵守我刚才所述的一切规矩——我同穷人游击队一起工作了17个月。后来，马诺洛同我谈到了穷人游击队对危地马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所作的解释和分析，并向我说明了，为什么武装斗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穷人游击队打算干什么？它如何利用群众和实现宗教和政治的团结？穷人游击队如何去夺取政权？以及一旦夺取了政权，必须要实行的革命计划是什么？——顺便提一下，那就是计划于1981年年底或1982年年初要发动的一次事件。

马诺洛后来又对我说，作为穷人游击队的一个成员，我的任务是继续在移民协会中进行工作，但要带着一种新的政治倾向。我必须尽力根据穷人游击队的一切政治和军事原则管理这一组织。

在移民协会中工作了大约十个月之后，有人对我说，鉴于我的能力，最好把我调去干别的任务。我被派到当时为最高机构的全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内担任新的工作。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要从政治上指导和协调在全国一级进行的全部宣传工作。根据设想，我们在全国家宣传委员会工作的人的任务是，制订总的指导方针，尽管每个基层组织仍然个别地负责具体的宣传工作。

这就是我如何起到积极的作用和同全国宣传委员会一起合作的将近九个月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一直处在天真、无知和十分谬误的状态中，说起来，真有点不可信，那时，人们问起我有关的问题时，我根本就答不出来。我怎么会相信，主张和武器是分开的；我怎么会想到，我前面提到的三种武器在搞颠覆性的暴力时，不会成为直接行动的基本工具？甚至在现在，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感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它不象人们开灯或关灯那样可以马上发现的东西，而是象一种病毒感染，其症状只有在潜伏期后才显示出来。

顺便说一下，我在谈及我的履历时，忘掉提到，我还在危地马拉的圣卡洛斯大学学习过三年的医学。

好，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在全国家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时间呆得越长，就越喜欢我作为一个理论宣传者所做的工作，越感到有必要去过一个真正军人的生活，去参与军事实践，即，接受基本训练和执行一套规矩和安全措施，因为在全国家宣传委员会工作的人如果没有军事经验，那是不可思议的，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有多大的才能。

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不利条件和危险。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1年6月8日。我发现我已不可能提出离开穷人游击队的请求，我作为一个真正军人的17个月的经验足成为拒绝我的辞退的理由，而这种情况在一个民主机构中是不会发生的。我认识到，我除了失踪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要按下述的办法失踪：为充分解释上帝信息的含义的目的而失踪，因为

当时我认为我有资格传播这一信息；因此，我同我在圣卡洛斯大学的一个老朋友取得了联系，然后，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的那样，作了自我劫持的安排。

在治安部队中，我找到了真正的兄弟；在122天的隔离期间，我从未付出过什么代价，从未经受过酷刑或困难，也从未缺少什么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让他说这些的，或者，他正处在某种形式的压力下”，但是，从我内心讲，这确实是我能向各位谢罪的最诚挚的方法。我希望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能作出更深刻、更全面的谢罪。既然我已向各位谈到了我之所以会在穷人游击队中战斗的原因并叙述了该项工作的部分内容，那就愿在我结束发言之前坦率地发表下述的看法：有些建议应该提出来，而这个讲坛正是提出这些建议的最适当的地方。我深信我在治安部队里找到了这方面的共通的心声：他们有正义感，他们尊重生活；他们真正想要在这个国家里避免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他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成长，能真正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先前的看法，我们在穷人游击队里对政府及其民主机构看法，因为我相信有许多事情值得各位注意，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必须由各位去纠正，因为各位对我们人民的历史结果负有部分的责任。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提出详尽的建议，但我愿指出几点。我很清楚，教育部为使我国最边远地区的人民受到教育正在作出特别的努力。但是，有必要作出某些改革。我认为，高度的学究式的做法不再适合我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比例，我认为，中学肄业证书应该多样化以适应不同的倾向或发展去向，应将学生们随后送到诸如技术培训专科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中去学习。很显然，在中学肄业生中，只有1%的人或近似1%的人能上大学。应提供某种属于秘书性质的工作，课外的的工作。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我国国内的大多数青年人90天的时间无所事事，这是一种潜力的浪费，因而他们不能为我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做一点事情。

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第一点。再有一点是关于移民问题的。这是我在城里最熟悉的一个方面、移民们的要求、他们要各个机构和主管当局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他们的需要，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之作出努力，立刻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我明白，在寻找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时，会遇到许多问题，

这就不由我在这里就那些次要的问题进行过多的争论，我只想谈谈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不懂，怎么可能化了九个月的时间才为居住在贝塔尼亚定居点内的一个社区安装了一个公用的水龙头。这九个月的时间就为各种各样的活动分子提供了接近人民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宣传：市政府可能不是满足此类需要的最好的门道，也许其他的办法，如暴力和夺取政权，可能更奏效。我认为，如想使游击队组织失去它们仍在争取的社会基础，就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基本需要——住房、保健、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要。

在我向各位讲话前不久，我曾有机会也同主教们谈了话，由于灯光的原因，我在这里看不见他们，我请求他们，或更确地说，要求他们能注意我所非常强烈地感到的某些事情，那就是，基督教会应团结起来，应只有一个主教的领导，这个领导应是此种不会被任何一个革命组织所消灭的、传统的永久的信仰的先锋。显然，在危地马拉，存在着一个基督教会，人民应该知道这个教会的领导人是谁，以及他们如何使其机体具有生命力的，这样，就再也不会出现反基督教会的或平行的教会组织，就再也不会存在类似正义、和平、革命的基督教徒组织或象维森特·门丘等的教徒，他们试图在提供一种带有偏见的答复的同时，提出某些过分简单的、会被那些总是渴求操纵群众。革命组织利用的祈祷文。

假若有时间，我愿提出更多的建议。最后，不妨向在座的父母和在自己家里听我讲话的父母们直接提出一点建议。1981年可不是让你们的孩子们盲目地去接受天主教教育的年头，仅仅因为你们认为学校是由些僧侣或牧师管理的。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你们始终负有责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你们创造出能培养孩子觉悟的课外活动；你们必须要了解用以向小学生们灌输新的社会思想的课外工作、必须要知道那些在开展提高觉悟的活动方面负责提供主要的指导方针的教师是谁？谁在教授文科和宗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父母同自己的孩子交流感情，更需要父母分担对他们的教育责任。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负部分责任。

我就要结束我对各位的讲话。下面我想谈一下我亲身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人性的问题：在我自愿投奔我所信任的治安部队时——我必须承认，一开



始，我是有几分害怕的——我发现我的生命得到了他们的饶恕。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显然由于他们的优待和对我的品格的尊重，我有了更加深刻的改悔认识了我的罪行，并对新的前途作了安排。多亏各位光临并耐心地听我的讲话，多亏全体危地马拉人民收听我的讲话，而且我相信，他们必定会宽恕我，我才有机会请求给予最大的宽恕，而此种最大的宽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当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罪责、自己的缺点，敢于正视现实，会说“我应负责，我参与了在我国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在各位是否会相信他的时候。各位可以就在这里对我说，我宽恕你，或者，我不宽恕你；一个人的自由是十分奥秘的，但必须要得到尊重。但是，我知道，我在转变的第二阶段，当着我用我实际的行动、我的日常工作以及我作为一个牧师应该有的忠诚和笃实向各位显示我将要进行的新的工作以及我的新的生活方式时，一定会得到各位的真正宽恕。在我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在我离此之日，各位就会知道，你们即刻给予我的或几月之后给予我的宽恕是否给得对。

很清楚，只有历史才能给予某个堕落到如此地步的人以空间和时间去寻求宽恕，而我再次确信我会得到各位的此种宽恕。此种宽恕是很必要的，犹如承认我的罪孽一样的必要。试想一下此种罪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所敬慕的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夫在这种难于形容的担惊受怕的生活中度过这120多天？尽管对于我来说，一天天是在希望中度过的，但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疑问，一天天是在痛苦中熬过的。

我愿一千次地请求危地马拉人民给予我宽恕，我愿回答在座的任何一位提出的任何问题。在我说到我深感内疚以及我已下了决心再也不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时，请各位相信我说的话。各位，请当心，不可受到大量的革命组织和移民协会等等的病毒的感染，更不要轻信那些自称想要结束做法而在这样说时又歪曲做法使之不能结束的组织了。暴力不会导致敬爱，天国不可能在罪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会带来我们大家所需要的姐妹般的和兄弟般的和解。

多谢各位。

（鼓掌）

(托莱多·别尔桑, 记者): 各位同行, 路易斯·爱德华多·佩列塞尔·法埃纳神父已作好充分准备, 愿意回答各位所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为方便交换意见, 我们愿请各位记者、外交官、私营机构的成员、商会、工业界和建筑业界等方面的代表, 以及大学校长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并一次只提一个问题, 这样, 神父可以更容易地回答这些问题。

我请记者埃尔南德斯先生发言:

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先生, 我只想问问佩列塞尔神父, 是否其他耶稣会牧师也参加了“圣经代表”这一组织, 乡村居民以及工人阶级对他们在萨尔瓦多进行的工作以及对他本人在危地马拉同穷人游击队一起干的工作反应如何?

(佩列塞尔神父回答说): 为要回答这一问题, 我必须要改变一下做法: 早先时候, 我一般地讲到了此类的现象, 以便大家了解形势, 根据各自的具体工作领域作出分析。 现在, 我得详细叙述, 既要实事求是, 又要避免涉及同此种形势无关的人。现在让我给你一个精确的回答, 我们在三个国家中开展了上述组织的工作, 这一工作引起了参与此类工作的差不多所有的年轻的耶稣会会士以及某些年长的会士, 鲁蒂里奥·埃尔·格兰德牧师等的直接的几乎是自发的反响, 此类工作遍及整个中美洲, 在洪都拉斯的乔卢特、萨尔瓦多的阿吉拉尔斯、我国的高原地区、尼加拉瓜的中部和北部以及巴拿马的奇里基地区都在进行。 换句话说, 此类工作已成了一项带有普遍性的工作。 我所认识的我一带的耶稣会会士当时差不多都参与了。我们在一起干的总共差不多有15人, 此外还有一些尚未任神职的牧师, 或称还未起誓的牧师和直接隶属于主教的牧师。 你问道我有关萨尔瓦多人民的反应的事。那里有必要进行改革。 我请你回顾一下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特殊情况。 我们这些研究分析家, 姑且把我们自己如此称呼吧, 曾经说过, 在萨尔瓦多由于缺少土地以及由于人口问题和缺少一个中产阶级, 存在着一触即发的形势, 使穷人和富人的力量向两极分化, 因此, 几乎任何一种宣传, 只要制订得恰当就会找到由此种宗教启示燃起的革命之火。 很显然,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到的宗教的启示有着它的有利的条件, 那就是传播宗教启示的人享有的那种权威以及不知多少年来就已存在的那种威信、传统和信仰, 但是几乎任何一种制订得恰当的宣传都会收到类似的效果。但是, 在尼加拉瓜, 反应并不强烈。 在1977年年终时, 尼加拉瓜的农民和

一般的人实际上并不关心独裁统治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普遍认为，四十来岁的人已经习惯了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的局面，一直到1977年12月发生了有名的占领何塞·玛丽亚·昆特（索摩查政府前部长）的住宅事件之前，人民不知道如何能把索摩查换掉。但从那时以后，就出现一种想法，一种感觉，认为独裁统治毕竟是脆弱的，其结果是，农民对“圣经代表”这一组织的反应……因为该组织声称……。

（记者奥尔加·潘托哈·埃雷拉）：听了你的讲话之后，我想问问，耶稣会在危地马拉的其他教会中的活动情况如何？

（路易斯·爱德华多·佩列塞尔神父回答说）：耶稣会始终把在那些会加强其活动的部门或集团中开展工作作为一项原则。在整个拉丁美洲以及在92个设有耶稣会的国家中建立的天主教学院始终是为为此目的服务的，试图影响那些耶稣会认为未来的人，即将要掌权的人的教育，以便从上面开始，从金字塔的顶端开始培养一种人道主义的和基督教的态度。后来，这一做法之所以被放弃是因为发现，这一做法实际行不通。耶稣会然后决定开始影响所有权力集中的部门。对危地马拉牧师联合会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该联合会包括了危地马拉的所有的宗教教会和全体教徒。因此，联合会是施加影响的一个理想的地方，可以使耶稣会的工作收到多方面的效果。这就是耶稣会同其他教会之间的关系，尽管耶稣会已经同危地马拉的马里诺尔的神父们和SKET公理会的神父们，以及同巴拿马的多明我会的教士们和尼加拉瓜的萨勒扬会的教士们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中美洲日报》记者安东尼奥·奥尔蒂斯问）：佩列塞尔神父，你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牧师愿意恢复他们的原来信仰，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

（佩列塞尔神父回答说）：我确信会有的。我必须明确的说，这里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在第一类人中，包括了我的许多朋友，例如，原耶稣会牧师费尔南多·奥约斯和恩里克·科拉尔，他们已在穷人游击队中起了多年的作用，也许有八、九年吧，他们现在陷得很深，甚至已开始直接参加军事行动；我很难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去寻找这样一种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适应个人利益的机会。我的第二点的看法是，就危地马拉的大多数教士来说，如果他能够找到某种谈判的方式，如果他们发现有可能促进民主制度的生活，如果他们认为，同教会的领袖建立紧密的关

系是可行的，那末，他们肯定愿意马上再次信奉那些和我的观点相一致或类似的观点。我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对于修女来说尤其如此。

(记者吉列米娜·罗德里格斯问)：路易斯·佩列塞尔先生，你在你很专的发言中承认了你在我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起了作用，那么，你现在难道不认为你不配穿牧师的衣服么？

(佩列塞尔神父回答说)：谢谢你所提的问题和所用的直率语气。我的回答也是非常直率的。我当然不配，而这一点我在我的发言的一开始就说了的。只有各位的无限宽恕和人民的宽恕，以及只有我的坚强决心，再加上神的恩典，才能使我改过自新；只要我能证明我的善行和德行，我就会再次配穿牧师的衣服。在此之前，我最好不要作为一个牧师，而应作为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出现在各位的面前。谢谢你直率地提出问题。

(记者马科·图略·特雷霍·派斯问)：佩列塞尔神父，我想知道你是否在一切政治阴谋中注意到了有一个出谋策划的人在那里领导该组织，以及国内或国际方面是如何资助该组织的？

(佩列塞尔神父说)：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来说，在穷人游击队中是这样，因为所有的工作分工都很细，至于就具体的人来说，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显然，有的人职位，要比我的职位高得多，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才能也很高。我讲的是我所知道的宣传部门中的那六、七个人。很显然，在领导层中也有这样的人。现在我再回答有关资助的问题。我一直知道，穷人游击队的资金来自两个基本的方向：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他们从来不告诉我是哪些国家或数目有多大——以及他们委婉地称说：“补偿”，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偷盗。此外，说起来也许使你们感到震惊的，许多专门用来提供资金的欧洲公共服务机构，例如在危地马拉的国际慈善社，也为它们认为可行的交给它们的项目提供资金，作为一种对它们叫作人民组织的团体的直接捐助，但是，正如已经详细地阐述过的那样，此类组织属于二等的组织。因此，上述的这三个方面看来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方面。

(西班牙总领事问)：可尊敬的神父，你在你讲话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由于你的失踪，不仅使你父亲而且使你的家庭担惊受怕。几天前也就是前天吧，佩雷斯·阿隆索耶稣会神父的家庭在西班牙发表了一项有关阿隆索神父失踪

的公报。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具体消息么？

(佩列塞尔神父答)：可以。我在今天听到了有关卡洛斯·佩雷斯·阿隆索耶稣会神父失踪的事。他是西班牙人，当初作为一个中学教员来到美洲，在萨尔瓦多的圣何塞日校工作。后来，他被调到危地马拉，一直住在圣安东尼奥教堂里，这个教堂位于第6区，属于耶稣会照管的一个教区。他的主要工作是照管病人，我想，他还是许多医院和军区的牧师，但我只是在今天才获悉他失踪的。

(记者吉列尔莫·孔特雷拉斯·西斯内罗斯问)：神父，由于你的讲话太长了，所以你那精采的讲话给人一个印象，好象你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你还说到你要改过自新，我作为一个危地马拉人，考虑到这个国家所遭遇到的流血事件，我想问问你，你如何实际地想要在危地马拉人民面前证明你的悔悟是积极的、始终如一的或者说是适当的？

(佩列塞尔神父答)：请你重复一下你所说的记忆力强的含义，因为我不甚理解它的意思。

(孔特雷拉斯·西斯内罗斯说)：好的。神父，请原谅我。你的故事讲得太好了，因此，我无法知道，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还是因为这些是你所记熟了的事。

(佩列塞尔神父说)：是啊，这是我一生中本来发生的事——为什么不这样说不呢——我告诉你们的每一步、每一契机显然都是千真万确的。我应该告诉你，就在今天，在我来到这里之前不久，我有机会同主教们会面，同他们就同样的话题从头至尾地谈了一遍，这就使我恢复起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记忆力。因此，我所说的是对事实的一种坦率的、深刻的和自发的解释，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是以我的能力所能表达为限的。那么，我将如何改造我的生活呢？我将在何种基础上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活，这就触及到了我要说的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的转变还是最近发生的事，犹如一个新生的婴儿。一百二十二天的时间不足于消除十四年来在使用我前面提到的三种武器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一百二十二天的时间使我成了好象一个新生儿，因此，要使我的新的生活旺盛、发展和有意义，我需要最好的条件和待遇。何为最好的条件？我已决定，首先我要果断地脱离耶稣会；迟早，我将作为该会的一个成员，或许回到尼加拉瓜，或许回到萨尔瓦多，或其他我们在

那里开展工作的中美洲国家。 我确实不想再让此类事情发生，我要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将告知他们，从此刻起我要脱离耶稣会。 这是我第一次向任何人谈到这一问题，而这又是唯一能让他们知道我脱离耶稣会的办法。 出于明显的安全理由，我已决定不住在危地马拉，这样，我可以自主地干着作为牧师和工程师的工作。 我不能确切知道我将住在何处，但我的确知道，我将尽我的一切可能，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里作出贡献，以便促进和平、自由和正义，而这些是其他国家人民，如同我们自己一样，十分需要的东西。

( 现由我们的一位同行发言，很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 )：佩列塞尔神父，他们对混入政府的兴趣如何？ 他们这样做了么？ 如果做了，是怎样做的？

( 佩列塞尔神父答 )：尽管混进政府里去被认为是大敌，但这确实是一件计划了的事情，一件已经设想了的事情。 只是因为政府的结构，政府的具体组织，但渗透难于实现。 他们试图尽量渗透到政府的最高层里。 例如，去年十一月，我想起，当时曾有一封信散发给了国家警察部队的官员，以图获得他们的名单和通讯地址，好通过同他们的居处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一渠道来扰乱、破坏政府和治安部队的实际结构。 他们并没有提到名单。 当时，他们的做法有点象寓言中的狐狸，嘴上说：“我根本不想吃葡萄”，而事实是，想吃也拿不到。

我们对于政府部门中的下级机构一点也不感兴趣，或者说，那些与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人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不能提供足够的情报。 尽管当时大家认为很难克服通向高层的障碍，但同时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同政府中的各个组织里的中层人员进行情报交易。 因此，我们十分注意对我们不适当地称作是敌人的政府进行渗透和扰乱。

( 记者特雷德萨尔科夫人问 )：神父，你已经回答了几个我想问的问题。 我们颇感兴趣地听了你的自我忏悔，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你所具有的知识和宗教地位，我们不该是那些宽恕你的人，这是应该由你同“天堂”里的人来处理的事情。 但是，我作为一个报人，一个天主教徒，愿意问问你：当你脱离耶稣会时，你还能当牧师么？ 因为人们知道，耶稣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会，具有几乎可以说同共济会一样的特点。 你研究过这个问题么？ 你想继续当牧师？ 还是彻底和它告别，专心搞教学？ 如果你彻底和教会告别，你又有何种感觉？

(佩列塞尔神父答)：尽管我有必要离开耶稣会，但在同所有这些人共同生活十四年后骤然分开，自然使我有有点伤感，好在我已经成熟，已经三十五岁，我能作出这些必要抉择。要是我还在耶稣会内，我无法执行我的新生活计划。我再说一遍，对于我来说，离开耶稣会并不意味着离开教士的生活，对我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我现在需要在某个国家内找到一位了解我的背景和我的能力，知道我的罪孽和我自新打算的主教，一位愿意把我纳入他的僧侣集团、纳入他所管辖的教区的主教。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主教愿意为我这样做的话，我只好实事求是，不再当牧师，因为我的任何职能都将不会有价值。然而，我想会有的，我想会有许多愿意宽恕我的具有善心的人，正由于这一点，我才想去寻找一位愿意为我这样做的主教。

正如你刚才说的，耶稣会是一个严格的教会，它有着 400 年的实践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35,000 名成员。下面我要说的也许是你想要提的问题之一。耶稣会不会相信，我的证词，我正在向人民、向各位所作的声明是深刻的、是我个人的、是诚恳的。也许，在他们听来有点象预先编造的。他们肯定会指控当局和治安部队，要当局和治安部队为我在各位面前自发地作出的这个声明负责。请相信我，耶稣会是十分自大的。

(《公正报》记者玛丽亚·德尔马女士问)：先生，在你的讲话中，你提到了“比利时修女进行的活动”的问题；我想知道这个“乌斯潘坦活动”是否同游击队有联系？

(佩列塞尔神父答)：这个活动同各游击队组织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它对促进教堂联合委员会在高原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大约有八、九年的时间，比利时教会的修女们让她们的学生们了解该地区的生活现实，激起学生们对那里的情况的同情，但不太注意如何去解决，那里已经出现的形势和指导这种形势的发展，使年轻妇女的情绪不致受到影响。该教会的真正名字为“神圣之家”，而“神圣之家”的修女们在埃尔基克省另有居处，另有村社；教会的成员们直接在该省的各个小村子里开展工作。因此，他们了解教堂联合委员会的早期工作，而且帮助了和大大地促进了该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他们为教堂联合委员会本身的工作贡献了力量，而且，正如我已说的，尽管后来的关系并不明朗，但它已成了通向社会的大门。因此，尽管已经建立的关系或已经作出的贡献可能在开始时是无事的，以及尽管我

还得说明，我不能说所有的修女如何如何，但我必须说，其中的有些修女也许通过她们的学校和“乌斯潘坦活动”的渠道，确实给游击队的事业直接提供了帮助。

(记者莫塔圣克鲁斯问)：你愿意给其他耶稣会会士和宗教团体的成员提供何种忠告或指导，以避免扩散你所提到的那种形式的病毒？我还有一个问题等一回再提。

(佩列塞尔神父答)：好，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实际上是个常识范围内的答复，那就是，不存在两个福音书；不存在两个耶稣基督；不存在两个上帝；也不存在两个教堂。只有一个信仰，即一个我们始终笃信的信仰；只有一个上帝，即一个我们希望拯救我们的上帝；也只有一个教堂，即一个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教堂，不管它是耶稣教教堂还是天主教教堂。因此，我建议应回顾一下问题的起因，回顾一下现实，那就是，目前正在出现的变化，从宗教转变到暴力、转变到革命组织中的战斗性的这一过程，所有这一切，正如我前面已经说的，决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而是属于因每天正在犯下的一系列无知的和无意义的行动而构成的过程的一部分。打个适当的比喻，有点象嗜酒成癖的人：他一开始并没有这个习惯，只是整年累月的喝；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这个习惯。因此，我的忠告是要回到对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所表示出来的这种唯一的、基本的爱的根源上来，同时要以全部的兄弟情谊聚会在有组织的教会里。此外，应努力通过行使教会的特别权力来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找出答案；而我认为，教会的特别权力在于它具有的批评能力：告诉人们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个办法比那个办法好；以及为此目的，保持着同国家的其他当局经常进行对话的能力。

我想，这就是我要提出的基本忠告，也就是我所想到的最为切合实际的忠告。

(记者莫塔·圣克鲁斯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你要所有听你讲话的人宽恕你，但我们都是人。难道你不认为，应该宽恕你的是上帝，因此，难道你不认为是上帝才是你应该祈求的吗？

(佩列塞尔神父答)：你说得对，我已经向上帝祈求了许多次。我还是在精神和宗教方面享有过特权的。我认为，我在耶稣会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方面。它使我能同耶稣，同我们仁慈的上帝，永远伟大的上帝保持经常关系，友爱相连，情谊相通。请相信我，当我说到我始终这样做时，我始终指的是我所首先



祈求的上帝。但是，我不得不同样祈求你们的宽恕，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你们身上我见到了上帝，在你们身上，我必定会继续见到上帝，在你们身上，我必定会发现他的存在，而这些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不可能以任何别的方式去直接祈求上帝的宽恕。因此，我再次请求各位，请求我的其他兄弟们宽恕我，因为我热爱你们正如我热爱上帝一样，而在我请求你们宽恕的同时，我知道，我已经直接向上帝祈求了宽恕。

（记者卢纳·莫利纳问）：鉴于你有丰富的经验，我想问问，你将提出何种能对其他所有参与颠覆的人，特别是对天主教徒起作用的建议？

（佩列塞尔神父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提一下我们叫做的中产阶级，我用这个词，并无贬意。比如，我认为，在危地马拉，不仅需要民主机构，而且需要更多的各种形式的能让危地马拉全体人民参与的民主机构，因为我发现，在和我讲过话的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出这样一种深切的感觉，说道：我能做什么？我如何能为我的人民作点事？而且，常常因为缺少机构的和民主的渠道而使它们作出两种可能的反应：他们会说，我不是搞政治的，就让政治家们去解决国家的问题吧，或者说，目前只有那些革命组织才能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提供解决办法。此时，我所想到的是给那些成年人和成熟的人所作的回答。至于年轻人，那就更难回答了，因为我经常见到旧时的两性秘密，比如旧时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秘密在今天是如何变得具有政治价值的。比如，一个年轻人为要看一个按他的年龄不该看的色情电影，他可能会巧妙地寻找一个能回避他的父母管制的时刻去看。自此之后，情况就变了，而目的是要离开家去参加一个地点又不能告诉自己父母的会议。他们经常出去时打扮得很神气，说一声，妈或爸，我去参加一个晚会，我会回来的，我会在某时某刻回来，或者说，我明天回来，于是他们可能去参加一个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参加的会议：个个打扮得很神气，因为个个都说是去参加晚会的。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回答。然而，我的主要的感觉是，当局应该注意到让人民了解所有的民主机构，了解已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我想我应该对各位说，关于政府为建立其基础结构过去和现在所作的努力，应该有更多的报导。就我个人遇到的一件事来说，只是在几个月之前，我偶尔翻阅《这里世界报》，才发现有个副文化部的。这意味着，消息报导得很不够，但

我得承认，我没有主动地去发现这个副文化部及其职能。但是试把这一回答同许多还没有机会阅读报纸，甚至还不会阅读报纸的人作个比较，就会知道，他们是如何更不了解此类的消息的。因此，要让所有的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有机会作出贡献，有机会感到自己是在为国家工作，让民主机构大大地发挥其作用，让民主机构更加普遍地建立起来。

(记者罗米欧·卢卡斯问)：神父，能否请你详细地说明一下牧师是如何渗透到农民阶级中去的？

(佩列塞尔神父答)：我已在介绍中和回答问题时提到了此类的渗透。现在，我再提供一个详尽的例子。农民团结委员会取得的成就之一在于它尊重农民特有的习惯、神话和并不围绕教区进行的一切宗教仪式——即并不围绕各种行会、兄弟会、改进协会和圣节庆祝协会等进行的宗教仪式——因为这些乡村中的组织通常是很秘密的。这些组织常常凭借村中的长者或较有权力的成员的经验行事，因此，很不容易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此外，这些组织所起的作用很小，不可能使其每个追求者起到作用。因此，教堂联合委员会接近这些组织，逐渐熟悉它们的情况，研究哪些方面可加以利用，最后得出结论：人民的宗教情感必须予以尊重。

其次是，人们发现，在乡村中还存在很大一部分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的人，因为这些人不属于传统的组织，所以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他们确实有某种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宗教信仰，于是“圣经代表”这一组织就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一组织的某些特点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临时举行的集会上做弥撒；牧师可以根据人们的爱好和水平行事；婚礼可以在不付任何规定的费用的情况下进行；在布道会上不光是牧师讲话，多少人想讲都可上台去；人们可在晚间单独进行会见；事实上，他们经常说，走吧，去参加“圣经代表”的会议，因为在那些地方，并没有其他形式的可供消遣的场所。

“圣经代表”这一组织设法激起的这种归属感和这种凝聚力便是我说的教堂联合委员会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事实上，教堂联合委员会通过宗教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日后用于其他目的社会组织的场所。牧师，特别是外国牧师之所以渗入和赞许这一整个组织，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对于他们在居民间，特别是在乡村居民间发现的匮乏情况习惯地很敏感，而且他们通过经济手段为解决居民们遇到的问题所作的努力通常是很成功的。假设他们发现村子中缺少的主要东西是学校，他们就写

信给他们原籍的国家、机构、朋友和亲属，要求提供比如说与万格查尔，用来建造一个学校。这样，在这个从未建造过学校的边远地区，一个星期内就建起了一所预制结构的学校，当地居民帮忙装配，这样，人人就都有课堂了。这自然使能设法做到这一点的牧师赢得了基本的承认，不象当地出生的牧师那样。一般地说，在有本国牧师的地方，教堂联合委员会并不很成功的，这不仅因为本国牧师控制着其余的组织，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职能富有竞争性。

（记者吉列尔莫·拉腊夫问）：佩列塞尔神父，你在“穷人游击队”战斗时，是否听到过有关罗纳尔德·麦克纳牧师的情况？你刚才提到有关获取警官名单的事，要把那些人的名单弄到手，使用了什么办法？

（佩列塞尔答）：你说的是多纳尔德·麦克纳神父吧。我知道，他是一个爱尔兰籍的牧师，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在我所说的比利时学校里听人提到过他。我曾经听到过那个修女学校的胡安娜·玛丽亚·索利斯修女，（我记得她的名字是这样），说麦克纳牧师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是一个很难和他谈话的人，他把危地马拉的问题看得很偏面，特别是他在某个外国（我记不起来是哪个国家）所作的一些发言充满着极大的危险性，他要求加快人民的步调。

至于第二个问题，正如我所说的，那是穷人游击队中从事军事活动的那些人的事。他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和全国宣传委员会的原因，就是想要发现和找到一种适当的办法，以便获取全体警官的人数，以及和他们取得联系的最有效的途径。全国宣传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卡洛斯·杜阿尔特说，“我们得向马诺洛要，他是全国委员会成员，他会取得这些名单”；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去搞的，但我确实知道，他们要求大多数移民协助他们，把那些自己知道的居住在边际定居点内和住区内的警察特务的名字提供给他们。他们说，即使大多数人提供了二、三个相同的名字，那也是有用的。

（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发言说）：佩列塞尔先生，你说，你有罪，而且要为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以及我们自己国家遭受的流血事件负责。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说，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国家，也可以去任何一个你愿意去的国家。既然你过去和现在都有责任，以及尽管你请求危地马拉人宽恕你，你是否认为你会得到这种宽恕，如果你不为了个人安全逃走，而继续留在我国

以及正如你已经做的那样，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从这个定居点到那个定居点去诉说你的经历，以便使你本人和所有那些可能会参与颠覆的人能真正改悔。

答：这自然是个理想的解决办法。我怎么不想去采用这一解决办法呢！我怎么不想去挨家挨户地诉说我的经历，利用我已经得到的机会呢！我又怎么不想去敲开每家每户的门，请求人们宽恕我呢！但是，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我不能指望治安部队的支持——我肯定，我会得到它们的支持——而是因为我这样做会使我自己处于同那些过去一直把我称作他们的朋友人的敌对地位，而且我认为，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或让他人有机会结束我自己生命的这种做法不是一种赎罪的方式，相反，只要我贡献我能贡献出的一切，只要我尽我所能尽我能创造和建立的一切，上帝将会首先赐予我所需要的神圣的宽恕，然后我将恢复起在此之前我所不能做到的有利于危地马拉人民的善行。因此，正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所述的解决办法不大行得通。

（记者胡里奥·莱穆斯问）：我相信，我听到了有关要在1981年年末或1982年年初夺取政权的事。我想知道一些有关实现这一目的的程序和办法的细节。

答：实际上，整个穷人游击队多次表示了此种意愿。我那些在全国宣传委员会中的同志们也敦促我支持这种革命的热情，而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种革命热情无论从科学的或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无足够的基础，难于在当时取得成功。当然，我没有勇气在该组织的内部提出这样一种批评意见，我敢于说的就是，我认为在今后的五、六年内，不会在我国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这些就是我一直使用的措词。我要是说出真心话，那么，他们会说我是政治上的无知，或者说我对人民的力量缺乏信心。还应指出的是，这种革命热情当着萨尔瓦多宣布总攻势的时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候，在萨尔瓦多散布的一切有关战争的消息都设想原先建立起来的军政府将会夺取政权。我个人有机会在去年一月底去了哥斯达黎加，他们邀请我看一个由人民解放武装拍制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除了题目为“萨尔瓦多将会战胜”之外，他们已经提出了将在三、二天内去萨尔瓦多夺取权力的人的名字。当时在危地马拉提出的口号是“昨天的尼加拉瓜就是今天的萨尔瓦多也就是明天的危地马拉”。

后来，由于发生了最后一分钟的延误，不得不把原定的日期延长，改在1981

年下半年或1982年上半年。 如何能实现这一目的？当时假定，游击队组织已经完成了其四个主要阶段中的两个阶段：那就是，已经完成了它的秘密工作，即筹备工作，以及已经完成了他们称作的树立威望的工作，即，使外界了解它并取得国际承认的工作，而现在是处在据说是“全面开展游击战”的阶段，把所有的群众集中到所谓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去，然后，照我过去的那些同志们的说法，调动起一切必要的军事力量，同军队直接对抗并夺取权力。 这一切是我始终所不理解的，但既然我因分工不同，不属于另一“集团”中的一份子，我只好抱着“信不信由你”的态度，当然，他们也要求我加入到这一革命的热流中去，我猜想，这一革命的热流是同在1982年夺权的行动相一致的。

（《报导和近况中心》记者圣克鲁斯·诺列加问）：佩列塞尔神父，我很想知道游击队战士是如何，也就是，你们是如何把危地马拉西北部的伊希尔族人和奇契族人团结在一块？

（佩列塞尔神父答）：好的，不过因为下述一些原因，我拿不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坦率地说，我对于危地马拉的实际情况是很无知的，我只是在最近才听说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在1960年代初期（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以便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占用各位时间，请各位耐心，但我认为这方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高原上的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于生产，造成这一情况的有两个原因：由于土地的世袭转让制度，小农田的数目逐渐增多，由于咖啡的生产除非大面积的种植否则无利可得，因而大庄园也日益增多。 其结果是，农民们都从乡下移居到城里，什么种族集团，什么作为伊都尔族人、基契族人、卡契克尔族人所有的特点，都置之脑后，只是感到自己象个混血儿那样在城里同另一些混血儿一起寻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 但是，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所谓的“绿色革命的奇迹”，有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发明了以硝酸盐为基本成分的化肥和杂交种子加上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由于使用了这种化肥，土地又可用于生产了，其结果首先是，印第安人认识到，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去，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靠种植传统的作物来谋生，这样，他们作为印第安人，在1960年代结束时，重新获得了重要性。 在1960年初期，我们都会认为，印第安人会说：我首先是个受剥削的农民，然后才是个印第安人。

但是，到了1960年代中期，情况倒转过来了，他们说：我首先是个基契族印第安人，然后才是一个受剥削的农民。这对于教堂联合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来说，是个需要克服的困难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一直在试图接近他们，但该组织取得的成功显然在于尊重种族的情况以及适应言论的基本需要：就是说，不管他们是伊希尔族人还是基契族人，也不管他们是马姆族人、波科马姆族人还是别的什么族人，他们首先都是受到这一制度剥削的农民，至于他们属于哪个种族的问题只是第二位的，但必须要尊重每个种族的语言、习惯和传统。这就是他们所以能克服他们间分歧的基本原因，但我在这里只能作个理论上的回答，可不是吗？！

（记者塞尔希奥·卡萨索拉问）：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才参加耶稣会？在你所参加的颠覆组织中的人是否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或支持？

答：我之参加耶稣会还有一段历史的渊源。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参与危地马拉中学的玛里斯特兄弟会，但我从未想过要当一个牧师。正如我已经说到的，中学毕业后，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念法律还是念医学。然而，我在圣卡洛斯大学时，我遇到了一群哈维尔中学1963年届毕业班的男校友，他们经常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请我去哈维尔中学操场玩，这一天刚巧耶稣会会士作弥撒的日子，这就是说，他们请他们的男校友去进行体育活动，以便后来把我们带去作弥撒。他们就这样把我看作是这些男校友之一，而这也就是我逐渐了解耶稣会的过程，在我决定我的职业时，我认为，当牧师是个最符合我的期望的职业，因为它的工作领域范围很广。至于穷人游击队得到的援助问题，耶稣会用它的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的捐款，直接提供了援助。我必须再次说明，在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上司有时明知我们的参与，他们也不给予正式的批准，但至少表示明确的同意。其他的援助包括了在有耶稣会的90个国家中的其余的耶稣会成员所取得的用以满足各种来自危地马拉的请求而提供的捐款，以及主要由欧洲和美国提供的一些资金和财政资源。顺便在这里提出另一个问题：在危地马拉有些事业单位可称之为亏损单位，例如某些文化广播电台。在那里缺乏检查或说缺乏严格的会计制度，有人去那些单位问他们：你们怎么能在长期赤字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一个经济非常景气的时期？此类收入的单据有吗？就印刷法，甚至就广播许可证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遇到过许多电台广播员，他们持有用西班牙语进行广播的许可证，但在广播时用的

却是当地语，或者虽然持有用短波波段广播的许可证，但在广播时却用的长波波段。

（记者科罗纳达问）：神父，你说耶稣会受到了穷人游击队的感染，我想知道是否其他的宗教团体也受到了这方面或那方面……（删掉——原文注）的感染……他们不能说政府的坏话，因为我是……耶稣会……我请你回答……。

（佩列塞尔神父答）：是的，我说过耶稣会同“穷人游击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耶稣会通过其富于战斗性的成员以及直接的和坚强的支持同游击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情况在危地马拉也类似，我想，应该提及的是比利时教会的“圣神之家”中的有些搞颠覆的成员，至少其中的某些成员，至少有四、五个吧。还有：基督教兄弟会的某些成员，也许还有圣母升天节组织的某些修女，以及一个叫做“Desquet”的宗教会的许多成员和（……）教会的某些成员。我要回答的第二部分是，如果我必须要提出辞职，这就涉及到应如何提出的问题，我只能通过管辖中美洲教区的大主教提出，因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要给他写信，告诉他我要辞去自己的职务，然后，他再同阿鲁佩神父一起处理；通常，此类程序要化去大约六个月的时间。

（《自由新闻报》的罗伯托·莫利纳德莱昂问）：神父，根据你的发言，耶稣会被控为一个颠覆的中心。鉴于这一事实，你是否认为，如果耶稣会成员继续在危地马拉呆下去，将是对危地马拉的组织机构的威胁？

（佩列塞尔神父答）：是的，我同意，一般说来，耶稣会同我作为其会士的本人通过我在前面告诉你们的我们鼓吹的歪曲了的信条，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已经成了这一颠覆事业的帮凶。至于是否让耶稣会继续在危地马拉存在下去的问题，我想，不让此类教义扩散的办法之一是进行对话以及严肃地提起注意，甚至对他们的工作实行管制，这样做是特别考虑到下述原因的。拿危地马拉的总共42个耶稣会成员来说，我认可其中的大多数是外国人，西班牙人。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其中只有三个成员是危地马拉人。此外，耶稣会在危地马拉已经存在了大约55年至60年，而且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那就是，我们中间对此类颠覆活动负主要责任的人现在已在我所提及的那些地方，在我本人提出请求宽恕的同时，我们已在进行对话并严肃地引起了注意。我认为，这些都是必要的。

××记者发言说：神父，我想请你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的上司是否知道你在搞游击队活动？他们是谁？

（佩列塞尔神父答）：知道我参加“穷人游击队”的我的上司有两个，一个是上级神父，他是管辖整个中美洲和巴拿马教区的大主教，另一个是负责训练年轻耶稣会会士的神父，即安·埃尔南德斯·比科神父，他是一个危地马拉籍的西班牙人。这两个人现在都在尼加拉瓜，同桑迪诺政府进行合作。

记者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大约有多少牧师参加游击队活动？

（佩列塞尔神父答）：要说出精确的数字，这就相当难了，因为我在危地马拉的工作从不涉及牧师方面的问题，不过，我猜想，大约有15个或20个牧师直接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但这只是一个估计数。

记者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反对诸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的宣传运动中，教会起到了，或者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佩列塞尔神父答）：这个，我已在前面说了，基本作用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解放神学的这一方面，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切中要害的问题，此外，它还具有双重的性质。 除了我提到的这一方面外，在今天，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一定要谴责任何显示出非正义或腐化之类的东西。 因此，他们就企图使此类指控产生最大的影响，激起人的最大的兴趣，首先是激起国际上的兴趣。他们已经达到目的，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他们做得很出色，因为教会当局而不是世俗当局非常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人们认为，一个牧师或一个修女或一个教士一般会说谎的，他们提供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而这对于那些热衷于实现所谓的同中美洲国家的团结的许多团体、许多人的工作来说都是原始材料。 因此，除了人员和财政资源等基础设施方面外，这一旨在反对危地马拉的指控运动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应由教会负责。

（记者门德斯·阿劳斯问）：我想问问游击战士佩列塞尔，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宗教组织，能起到一种你所进行的工作的场所的作用？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是否同大赦国际这一组织有直接的联系？最后，我想问你，既然你已经作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发言，你是否认为你可以写一本小册子或一本书，这样，你的证词可以传得更广，因而使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是如何活动的？



(佩列塞尔神父答)：好的。 事实是……当然有此可能将我的证词加以发表。不过，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在什么时候发表，何时做这件事最适当，尽管我确实感到，这样做是有更多机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我的证词。 至于同大赦国际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通过那些身为政府首脑、并曾在欧洲的大学里，在法兰克福等地学习过的耶稣会会士进行的，而这些人早就见过我所提到的现组织的一些成员。 因此，大赦国际秘书的私人电话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工具。 关于第一个问题，能否请你再说一下，我记不起来了。

(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说)：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就提出的建议，那就是，记者们一次只能提一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再者本地的通讯员和记者要回他们的办公室，因此，我将请下述二位记者按顺序提最后几个问题：拜伦·格迪尔(《电讯新闻》)、胡里奥·塞萨尔·埃尔南德斯。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次记者招待会。

发问者：神父，我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细节。 第一点，你作为穷人游击队的战士，是否知道游击队的军事实力有多大？以及是否知道游击队的阶级组成？

(佩列塞尔神父回答说)：我知道，它是四方联合组织中的最大一个组织，因为它的基本成员，即教堂联合委员会中的农民曾说过，他们的成员一共有8000人左右。 那就是一直在穷人游击队中进行活动的那些经常性成员。 那时，我始终不知道穷人游击队有多大。 由于明显的分工原因，我从不打听，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否定的答复，但我的确知道它是那四个组织中的最大一个组织。

发问者：它的阶级组成如何？

(佩列塞尔神父答)：组成穷人游击队的基本的社会阶级为农民和部分居住在工人住宅区内和边缘定居点内的工人阶级；此外，还有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但他们只起到管理和政治协调作用。

发问者：为危地马拉准备的最后攻势其破坏性有多大？他们使用的是何种类型的武器？

(佩列塞尔神父答)：关于武器的规格，我全然无知。 然而，有关人民革命战争是否会带来破坏的问题，他们总是说，他们尽量使其造成最小的破坏，因为在

尼加拉瓜的经验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危地马拉。 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我只认识其中的二人）一直说，我们不能白手重建一个国家。 我要告诉他们，为了让人民对卫生、食品、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需要进行破坏，直至我们开始铺路、重建公园和桥梁时为止。 马诺洛曾经说过，假使战争在这个周末爆发，那就让它爆发吧，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如果破坏小一些，那就更好，否则此后的重建工作要困难的多。

发问者：神父，因为时间关系，我把下面两个问题合在一块提。 继危地马拉之后，下一个处于共产主义目标之内的国家是哪个？你是否知道占领驻我国的西班牙使馆的行动同那些农民组织的成员有何关系吗？

（佩列塞尔神父答）：下一个国家——尽管社会主义还未设想或计划要侵犯的——是洪都拉斯，因为洪都拉斯的一些特点同其他国家非常类似。 他们一般地谈到所谓来自锥形体北部的革命的问题。 十年以前，他们曾认为，革命将来自锥形体南部，来自阿根廷。 然而，这种看法错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现在看来，是锥形体北部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 还应指出的是，那些革命组织对伯利兹的独立很感兴趣，因为它显然是一个有可能取得古巴援助的更方便的通道和跳板。 我想我已很累了，我不得不再次说，我已忘掉你提的第二个问题；能否请你重复一下？

发问者：通过你在穷人游击队中看到的战斗精神，你是否记得有任何农民组织参与了有名的占领此间的西班牙使馆的行动。

（佩列塞尔神父答）：是的，教堂联合委员会肯定同占领西班牙使馆这件事有关。 我记得有个叫做维森特门丘的人，此人是同比利时教会的修女们在进行“乌斯潘坦活动”时一起工作多年的人之一，修女们很熟悉此人。 此外，这些人都来自基契省。 因此，教堂联合委员会肯定参与了，后来，在纪念1月31日这个日子时，还出现了“革命基督教徒”这样的说法，指的就是维森特门丘，他是在基督教徒中，最急进的人士之一。

（最后，记者胡里奥·塞萨尔·埃尔南德斯问）：谢谢你，我要向佩列塞尔神父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耶稣会在历史上受到过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驱逐，比如，蒙特福尔神父……，墨西哥总统把他们撵走了。 拿危地马拉来说，在殖民时期之

前，就曾于 1767 和 1871 年发生过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和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的革命。你是否认为，如果现政府将耶稣会组织从危地马拉撵出去，这对于人民来说，既有利又是可接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作为一个职业的社会传言人说过，政府的基础结构工作缺乏报导。你是否愿意接受在政府中任职？此外，假定你是“穷人游击队”中的宣传、新闻和广告委员会的成员，你是否知道该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是谁？

（佩列塞尔神父答）：好啊，我希望我不再麻烦你，因为我的疲倦而要你重复所提的问题。事实是，耶稣会曾经多次遭到一些国家的驱逐。但这一方是因各种环境造成的，另一方，正如他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那是耶稣会的自傲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使我们多次遭到一些国家的驱逐。因此，我认为，由于这种自傲因素，这将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把我们驱逐走的仅有的国家，而且我还认为，他们试图从中得到的并会从中得到的国际上的宣传利益一定是很大的。假如我是政府的一个成员，坦率地讲，我不会这样做，我要同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一切保持一致。让我们首先尽力使用对话的办法，让我们首先尽力利用一切实际的机会，即耶稣会及其一切成员真正能为危地马拉带来福利的机会，同时不妨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告诫他们，如果他们要采取此类措施，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那样做必定会使政府的威信大大扫地，如果这个政府确实是个民主政府的话。你后来又说到政府的事，但我没有听懂你的话。

发问者：我说到你是一个职业的社会传言人。你是否愿意接受在政府中任职，以便使人们了解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比如，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要你同他一起工作，你干不干？其次，由于你是穷人游击队中的广告和宣传委员会的成员，你是否知道该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的名字？

（佩列塞尔神父答）：说出有哪些成员，那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一共只有四个人，那就是：恩里克·科拉尔（以前是耶稣会的牧师）、卡洛斯·杜阿尔特、维克托·德莱昂以及我本人。至于其他问题，如果政府确实愿意让我担任一项政治职务，我想，我会直率地承担和接受，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向我的人民作出的证明的一部分。至于有无实际的可能性，那是另外一回事。另

外一点是，要使每个人都了解我是否诚恳，以及诚恳的程度，还需一些时间。但是，既然涉及到的是改悔问题，那就需要看一看，就象植物种下、生长、开花、结果那样，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我认为难于为我提供一个此类性质的职务。不管怎样，我赞赏这一姿态，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我从你那儿已经得到的宽恕的表示。

( 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秘书发言说 )：我们感谢各位高贵的记者、外交官、私营部门的成员以及大学的领导今晚出席由这位耶稣会牧师举行的很重要的记者招待会。

在结束之前，我愿告知在座的各位记者，在今后几天内，凡愿单独和佩列塞尔神父进行简短会见的电视新闻记者、日报记者和电台记者，可以通过公共关系秘书处作出安排，因为佩列塞尔神父已表示愿意回答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未能有机会提出的任何问题。

多谢各位。

危地马拉，1981年9月30日

危地马拉共和国国会授权向危地马拉人民  
和世界人民发表下述宣言

1. 鉴于众所周知的情况，拉丁美洲和世界的政治形势严重地恶化了，使有关国家的人民的和平和稳定遭到了破坏。在中美洲，这种形势由于受到某些极权主义集团的明目张胆的干涉变得更加突出，因为这些集团不尊重危地马拉在其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守的原则，即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2. 近几年来，国际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恶化了，恐怖主义战斗集团纷纷兴起，它们把暴力和武装行动作为手段，用来攻击民主和攻击人民行使的通过投票选择管理他们的政府的权利。在过去的16年间，危地马拉一直保持着投票选举的这一原则，提供了可能更换共和国总统的领导的机会。

3. 由于共产主义的干涉，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建立了侵害人权、侵犯民族自决、言论自由，特别是侵害公民安全的政府；此种干涉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行动，而已采用了各种决定的形式，来向那些历来是民主的、和平的、渴望在自由、工作、安全和保持价值的基础上改变贫穷和不发达状态的人民传播马列主义，而在今天，改变和褫夺这些行为对拉丁美洲的自由人民来说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4. 对在传统上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侵略和内部颠覆已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制造了分裂和互相残杀的事件。除此以外，现已掀起了散布谎言和进行诽谤的运动，以及反对那些不愿受其粗暴支配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危地马拉已成为此种奸诈行动的一个合适的牺牲品。这些行动的目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维护人权的幌子下，通过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和支持那些把恐怖和暴力当作武器来使用的颠覆集团，试图威胁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摧毁其经济力量。伴随而来的则是贫困和饥馑。

5. 作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和国国会，我们不但致力于为全体人民制订出对社会有利的法律，而且也关注我们居住的中美洲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同时请全世界的自由议会客观地审视形势，这样，如果它们没有偏见的话，就可理解为什么我们会经历此种痛苦的遭遇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人民的鲜血来阻挡共产主义的前进的原因，唯望我们所做的牺牲能换取人们对迫近我国人民的危险的警惕以及引起注意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阵线以维护我们的民主的和代议制度，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适当的。

6. 鉴于我国的内政目前正遭受着明显的来自原先同我们友好的国家的共产主义的干涉，我们愿公开宣布我们拒绝接受此类行径，我们也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使用的威胁性做法，因为国际恐怖主义谋害农民和工人，破坏我们的生产手段，胁迫善良和纯朴的人们赞同其主张，以及绞杀其声称保护的人们。在这个我们正经历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因为我们认为，支持人民、支持政府和支持正在为捍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进行斗争的我国的军队，是我们的义务。

鉴于上述的原因以及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心，我们向我国人民和其他各国的人民、世界各国的政府、各民族发表下述：

### 危地马拉议会宣言

1. 致危地马拉的人民：我们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刻休戚相关，我们对每个社区里的弟兄们由于正常的和平和传统的友谊受到了威胁和破坏而遭受的不幸表示悲痛，深信，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恶浪不久就会结束，深信，曾经用美德以及对上帝和对我们弟兄们的尊重开拓起来的道路会重新恢复。

2. 致共和国政府：我们支持为制止互相残杀的斗争，为把劳动的土地和面包给予贫苦的人们、为克服愚昧、贫穷、缺乏谅解和暴力而作出的各项决定，我们也支持为维护法治和投票选举制度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因为投票选举，正如迄今已实行的那样，是人民按照民主的危地马拉传统，自由选择自己政府的唯一可用的办法，我们将于1982年3月7日举行的大选也是如此。

3. 致危地马拉的军队和警察：我们感谢他们为维持秩序、安全和公民自由以及为维护我们国家主权所作的一切努力，尽管他们牺牲了不少宝贵的生命以及在这个困难时期出现了正常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损失的同时，也发现他们试图保护的人民遭受了某些破坏和死亡。

4. 致那些破坏国家秩序和和平的人：我们公开、坦率和诚恳地奉劝他们要懂得理智、基督教的博爱观以及对上帝和对自己兄弟们的尊重，停止那些因他们的轻率或失误或误解而进行的血洗、破坏和致人死亡的行动，希望他们通过良心的发现，能把缺善少德的过去抛掉。

5. 外国的和无国籍的恐怖主义者：滚出危地马拉！

6. 致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的自由议会：我们建议，如果他们能对那些不适当地干涉具有很深的民主信念和坚守拉丁美洲价值和民族自决的国家的人的行动进行冷静的分析，他们至少会理解我们的危机并把我们的宣言作为一个生动的现实加以

接受：我们从未想过要恶化友谊，也不希望那些因受到歪曲的新闻报导影响的人对我们产生的误解，鄙弃我们，把我们当成受共产主义制服的第二个古巴或尼加拉瓜，因而构成了对拉丁美洲的其他自由民族的威胁。

危地马拉共和国国会，1981年12月15日

主 席

豪尔赫·博尼利亚·洛佩斯

第二秘书

第四秘书

戴维·阿图罗·维加·比列拉

阿诺尔多·卡诺·雷西诺斯

XX XX XX XX XX